



官方微信二维码



智库微信二维码



发展与交流中心二维码



社会调查中心二维码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 601 号中惠楼

电话：020-85221755

邮箱：iesr@jnu.edu.cn

官网：http://iesr.jnu.edu.cn

微博：@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自媒体公众号
“黄埔大道西观点”是智库的发声平台，为公众提供更加专业、客观、科学的观点。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发展与交流中心，致力于为政府企事业单位提供专业培训，帮助国内学子申请海外知名学府深造，采用全英语教授数理、经济相关知识，提供免费的专业英语培训。

社会调查中心隶属于经济与社会研究院，致力于开展多项大型、前沿的社会调查项目，为经济学研究以及政策制定提供坚实的数据基础，打造优质的学术公共产品，支撑研究院在相关领域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主编：武茜 徐梦瑶 樊静文

设计：李封乾

校对：冯帅章 崔潇濛 刘丛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



暨南大学
JINAN UNIVERSITY

IESR
Institute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暨南大学 经济与社会研究院

Institute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IESR

季刊 | 2021 年
10-12 月

- ▶ 全国前 5%！暨南大学应用经济学软科排名全国第 9！
- ▶ 李书娟副教授两篇合作论文正式发表于《经济研究》《经济学（季刊）》
- ▶ 张思思副教授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立项
- ▶ 我院严子中、卢晶亮、何李芮领衔项目获广州市委政法委采用
- ▶ 我院《高级计量经济学》课程入选广东省研究生示范课程
- ▶ 2021 广东乡村振兴高端论坛顺利举办
- ▶ 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受聘为暨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首席研究员

学院简介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Institute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IESR）成立于 2015 年 11 月，是暨南大学为建设高水平大学、推行经济学教育科研国际化而设立的教学科研机构。研究院致力于打造国内一流的应用经济学学科，开展大型社会调查项目，进行国际水准的学术研究，提供高质量本科生及研究生教育，建设高水平智库。研究院聘请教育部长江学者、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冯帅章教授为院长。2017 年 11 月，研究院荣登《中国智库综合评价 AMI 研究报告（2017）》核心智库榜单。2018 年 2 月，我院名列《2018 年中国智库报告——影响力排名与政策建议》社会类智库专业影响力排名榜前十。

师资建设方面，研究院延揽多名海内外知名高校优秀博士毕业生，聘请在国际上具有广泛学术影响力的知名学者担任特聘教授，打造一流的国际化师资队伍，构建与国际接轨的考评标准体系。学生培养方面，借鉴北美一流经济系的培养模式设立本科、硕士及博士项目，培养兼具国际视野且立足本国现实国情，能运用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优秀人才。

为了提升科研实力，研究院成立五大科研机构：微观计量经济学中心、国际贸易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生态文明与环境经济学研究中心、房地产与区域经济学研究中心及劳动经济学研究中心。劳动经济学中心与美国芝加哥大学人类发展经济学研究中心共同创建“芝加哥－暨南人类发展研究联合计划”，由冯帅章教授与 2000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芝加哥大学 James Heckman 教授共同担任负责人。2019 年，James Heckman 教授获得中国政府友谊奖。

此外，研究院下设三大职能中心：社会调查中心、政策研究中心和发展与交流中心。社会调查中心旨在开展大型社会调查项目，为政策制定及学术研究提供高质量的微观数据。目前已开展的调查项目包括：中国乡城人口流动调查、中国家庭就业调查、广东省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调查、绵竹儿童认知与非认知能力发展追踪项目、广东千村调查等。政策研究中心旨在数据收集及学术研究的基础上，针对有关国计民生的热点问题进行相关政策研究，提供高水平的智库服务。发展与交流中心致力于为政府企事业单位人员提供专业培训，帮助国内学子申请海外知名学府深造，采用全英语教授数理、经济相关知识，提供免费的专业英语培训。目前已与美国威斯康星麦迪逊分校、美国德州 A&M 大学、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新加坡管理大学、纽约城市大学联合开展海外硕士合作项目。

目录 CONTENTS

01 学院要闻

全国前 5%！暨南大学应用经济学软科排名全国第 9	02
新华社援引我院关于抗疫经验的研究成果	03
我院举行六周年院庆暨总结表彰大会	04
我院严子中、卢晶亮、何李芮领衔项目获广州市委政法委采用	07
我院张思思副教授受邀担任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副主编	07
我院苏应俊副教授受邀担任 China Economic Review 副主编	08
我院《高级计量经济学》课程入选广东省研究生示范课程	08
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受聘为暨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首席研究员 ..	09

02 科研动态

科研立项	12
论文发表	13

03 学术活动

学术会议	15
暨南论道	23

04 思想聚焦

乡村振兴专题	27
家庭经济学专题	36
好文回顾	47
媒体聚焦	52
暨济一堂	58

05 数据调查

中心要闻	65
绵竹儿童认知与非认知能力发展追踪项目	68
SEMINAR 回顾	70

06 对外交流

我院调研团队赴云浮调研城乡低保情况	73
暨南乡村振兴研究院调研团队赴清远、韶关、肇庆、江门等地乡村风貌带调研	74
暨南乡村振兴研究院调研团队赴揭阳、潮州、汕头等地风貌带调研	75
冯帅章院长随林如鹏书记赴梅江区域北镇实地推进乡村振兴工作	76

07 学生天地

学生培养	78
珠江经济学俱乐部	81

08 图说

运动会	83
-----------	----

学院 要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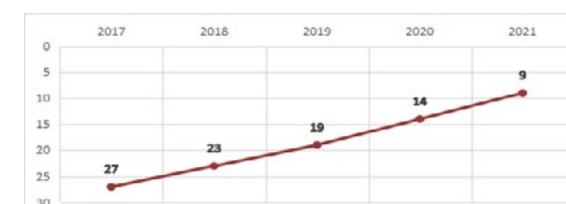
全国前 5% !

暨南大学应用经济学软科排名全国第 9 !



近日，高等教育评价专业机构软科正式发布“2021 软科中国最好学科排名”，暨南大学应用经济学排名进入全国前 5%，位列全国第 9 位，广东省第 1 位，全国排名较 2020 年上升 4 位。

近年来，暨南大学应用经济学科在“2021 软科中国最好学科”排名逐年攀升，自 2017 年的全国排名第 23 位提升至 2021 年的全国第 9 位，呈现出非常强劲的上升势头。



暨南大学经济学科 2017-2021 年
“软科中国最好学科排名”应用经济学排名情况

软科中国最好学科排名源自服务于高校学科建设管理部门的学科发展水平动态监测数据系统，2017 年开始计算学科综合排名并对外公开发布。该排名的指标体系包括人才培养、科研项目、成果获奖、学术论文、学术人才五个指标类别，下设 17 个指标维度，共计 50 余项反映学科竞争力的客观量化指标，涉及百余项观测变量。排名数据全部来自第三方数据源，如教育部、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国际和国内文献数据库等。

暨南大学经济学科历史悠久、实力雄厚，学科排名一直位于国内前列。凭借着高水平大学建设和国家“双一流”高校建设的东风，肩负着暨南大学经济学教育科研国际化的重任，经济与社会研究院（IESR）自 2015 年成立后已逐步进入稳步发展阶段。研究院的国际高水平

中国最好学科排名 2021				0202 应用经济学
排名层次	2021 排名	2020 排名	学校名称	总分
前 2%	1	1	中国人民大学	1207
	2	2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1078
	3	3	上海财经大学	952
	4	4	北京大学	918
	5	7	南开大学	855
前 5%	6	6	西南财经大学	852
	7	9	中央财经大学	792
	8	8	清华大学	754
	9	14	暨南大学	681
	10	11	复旦大学	589
	11	12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577
	12	13	武汉大学	555
	13	10	东北财经大学	517

2021 “软科中国最好学科排名”
暨南大学应用经济学科全国排名名次（部分）

论文的质量与数量实现“双提升”，已成为暨南大学经济学科腾飞的重要推动力，暨南大学经济学科自此迎来了跨越式发展。

根据 2020 年度荷兰蒂尔堡大学“全球经济学研究机构排名”，暨南大学经济学科在 35 本默认国际权威经济

学期刊发表数量并列全国第 9 位，广东省第一位。同时，暨南大学经济学科位列“2021 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中国内地并列第 8 位，2021 年上海财经大学全球高校经济学研究力排名全国第 9 位，均为广东省首位。

新华社援引我院关于抗疫经验的研究成果



美方在新冠病毒溯源问题上对中国的恶意诽谤与事实真相

2021-11-08 来源：新华社

美方在新冠病毒溯源问题上对中国的恶意诽谤与事实真相

2021 年 11 月 8 日，新华社学习强国号发布题为《美方在新冠病毒溯源问题上对中国的恶意诽谤与事实真相》的长文，文章援引了 2020 年 5 月我院副教授史炜、助理教授邱筠与耶鲁大学陈希副教授的合作研究。

研究表明中国采取的“封城”、社区封闭管理、隔离、限制户外活动等措施极大降低了新冠病毒传播速

度，病毒传播在 2020 年 2 月中旬得到了有效遏制。截至 2020 年 2 月 29 日，在中国实施的国家级和省级公共卫生措施可能在湖北以外避免了超过 140 万人感染和 5.6 万人死亡。

我院举行六周年院庆暨总结表彰大会



2021 年 12 月 2 日，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成立 6 周年院庆大会在中惠楼 323 室举办。出席本次院庆大会的嘉宾有暨南大学校长宋献中、本科生院执行院长张小欣、发展规划处处长顾乃华、社会科学研究处副处长黄晓燕、国际交流合作处副处长何睿弘、经济学院党委书记成兴以及经济与社会研究院的全体师生。本次大会由研究院副院长张思思主持。

院庆大会的第一项议程为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冯帅章对研究院一年以来各项工作的开展情况作简要汇报。



冯帅章院长

冯帅章从师资队伍、研究成果、人才培养、社会服务四方面展开了介绍。首先是师资队伍，研究院现有全职教师 43 人，包括正教授 3 人，副教授 14 人，其中长聘副教授 6 人，海外人才比例高达 90%。研究院师资队伍结构愈趋合理，同时在国际学术舞台上的话语权和影



张思思副院长

响力逐步提升。如近日研究院张思思副教授、苏应俊副教授分别受邀担任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和 China Economic Review 等国际知名期刊副主编。

研究成果方面，今年，研究院国际论文发表再创佳绩，助推应用经济学排名持续攀升。根据 2020 年度荷兰蒂尔堡大学“全球经济学研究机构排名”，2021 年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中国最好学科排名”、2021 年上财“全球高校经济学研究力排名报告”，暨南大学经济学科均排进全国前十，位列全省首位。

人才培养方面，研究院今年的 9 名硕士毕业生中有 5 名被清华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美国莱斯大学、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等国内外知名高校经济学全额奖学金博士项目录取，38 名本科毕业生中也有半数前往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杜克大学、新加坡管理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境内外知名学府进一步深造。

社会服务方面，研究院下辖的社会调查中心已连续 4 年顺利完成广东千村调查，完成了广东省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开展了广州市 2021 年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社会调查。同时，在广东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学校依托经济学优势及广东千村调查系统的微观数据、成立乡村振兴研究院。目前，乡村振兴研究院成立了以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为学术委员会主席、首席研究员的学术委员会，汇集国内一流专家，并组建了专职研究团队，做了大量调研工作，产出了丰硕成果。如研究人员提交的专报《广东与浙江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成因与对策》获得了广东省委领导批示。除了乡村振兴方面的成果，智库还持续关注流动儿童、留守儿童、住房政策等民生议题，研究成果《广东省婚俗文化及婚姻改革研究》获民政部民政政策理论研究一等奖。《广州市 2021 年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社会调查报告》获得广州市政法委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予以采用。外交部、新华社等官方机构、主流媒体援引研究院教师与国外学者关于抗疫的合作研究，驳斥了美方在新冠病毒溯源问题上对中国的恶意诽谤。

接下来，大会进入第二项议程，暨南大学校长宋献中发表讲话。



宋献中校长

宋献中对研究院今年取得的成绩高度肯定，他尤其提到研究院助理教授邱筠、副教授史炜与美国耶鲁大学陈希副教授关于抗疫的研究成果被外交部援引，成为驳斥美方在新冠病毒溯源问题上对中国恶意诽谤的有力证明。他认为研究院的教师虽然博士毕业于康奈尔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海外高校，但能扎根中国，能够真正地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研究留守儿童、乡村振兴等国家急需解决的问题，这条路是非常正确的。同时，宋献中还提到研究院作为暨南大学综合改革的示范区，在内部治理、师资队伍建设、人才培养、智库建设等方面已经探索出一套较为成熟的制度方案。在职称评审制度及程序方面，研究院为每位晋升职称人员设置单独的职称评审委员会，并以海外外审专家意见作为重要参考依据，对标国际一流水准。宋献中表示这一试点就是希望暨南大学的经济学科发展能够形成一套好的机制，能够在国际上有一席之地，能够成长出一批优秀教师，用以培养优秀的学生。大学的根本任务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国际合作都是为了更好地培养出服务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经济学人



才，培养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接班人。最后，宋献中希望研究院全体教师能积极探索，继续走出一条放眼国际、立足本土的特色发展道路，一起努力，助力暨南经济学科变得更有影响力，迈向更高的发展台阶！

随后，研究院党支部书记薄诗雨、副院长卢晶亮、史炜，院长助理谢斌，社会调查中心执行主任何李芮、办公室主任徐梦瑶从思政工作、科研成果、学生培养、智库建设、调查项目以及行政工作六个方面对研究院这一年的成绩进行总结，同时表彰在各个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研究院教职工。

总结表彰之后，研究院师生欢聚一堂，在中惠楼 118 室举办了六周年院庆联欢会。本次联欢会以“欢度院庆，启航未来”为主题，活动分为表演和游戏两大环节。师生卧虎藏龙，人才济济。大家纷纷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用音乐、用舞蹈为研究院成立 6 周年庆祝。精彩纷呈的表演，乐趣横生的游戏，赢得了阵阵掌声和欢笑声，师生热情高涨。

至此，经济与社会研究院 6 周年院庆总结表彰大会圆满结束。立足新的起点，研究院将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学校的决策部署上，不断强化自身特色，不断完善经济学学科体系，不断产出“顶天立地”的科研成果，关注中国问题，讲好中国故事，将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我院严子中、卢晶亮、何李芮领衔项目 获广州市委政法委采用

近日，我院助理教授严子中、副教授卢晶亮、社会调查中心执行主任何李芮等组成的项目团队受广州市委政法委委托，完成项目《广州市 2021 年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社会调查》。项目成员表现优秀，获得了委托方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项目团队独立客观地完成调查，组织实施科学，题目设计精准，深入分析提炼，数据详实严谨，所提交的《广州市 2021 年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社会调查报告》完成质量较高，报告予以采用。



我院苏应俊副教授受邀担任 China Economic Review 副主编

近日，我院副教授苏应俊受邀担任国际权威期刊 China Economic Review 副主编（Associate Editor）。

China Economic Review（《中国经济评论》）致力于发表关于中国经济及其与世界经济关系的原创性学术成果。其重点关注有关中国经济的制度变迁、政策与经济表现的定量分析类文章，同时也欢迎将中国发展进程与其他国家发展进程进行比较的研究。



我院张思思副教授受邀担任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副主编

近日，应人口经济学权威期刊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主编 Klaus F. Zimmermann 教授邀请，我院副院长张思思副教授出任该期刊副主编（Associate Editor）。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人口经济学期刊》，期刊五年影响因子 3.318）创办于 1988 年，是人口经济学领域的顶尖期刊，主要发表人口经济学各领域内理论与应用类研究的原创性学术文章，关注个人、家庭、家庭行为、人口政策、储蓄与退休金、社会保障、住房与卫生保健等方面问题。该期刊由联合国大学马斯特里赫特创新与技术经济研究所人口、发展与劳动经济学中心（Centre for Population, Development and Labour Economics, POP at UNU-MERIT），全球

劳动组织（The Global Labor Organization, GLO）和欧洲人口经济学会（European Society for Population Economics, ESPE）联合主办。



我院《高级计量经济学》课程入选 广东省研究生示范课程

近日，广东省教育厅公布了广东省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立项结果，我院徐吉良教授领衔的《高级计量经济学》课程入选广东省研究生示范课程。该课程面向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经济学院的博士生。课程团队由两个学院教师共同组建，包括严子中、林威、史炜、桂文林、谢贤芬。

课程内容注重理论与应用的结合，对计量经济学理论，特别是各种数据类型下的建模和估计方法，都给出实证研究的具体案例及解析实证应用方法，使得学生对复杂理论的理解具象化，将原本枯燥的理论变得生动有

趣。其次，作为博士生课程，内容的前沿性和对于学生科研的启发性尤为关键。教学内容既回顾教科书的经典理论，又博采众长参阅许多学科前沿文献。教学过程中，学生在文献阅读后，进行汇报，教师引导学生从“审稿人”角度对文献进行独立评价。再者，课程在教学形式上采用中英文双语教学，使用英文教材和课件。考虑到学生实际英语水平，主讲老师们在讲授过程中采用中文和英文相结合，循序渐进地加入更多英文，帮助学生以英文作为科研的重要工具语言打下良好基础。

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受聘为暨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首席研究员



2021年11月11日，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正式受聘为暨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首席研究员。聘任仪式于暨南大学中惠楼323室举办。暨南大学党委书记林如鹏、副校长王兵、人事处处长陈振强、社科处处长潘启亮、乡村振兴研究院、经济学院、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冯帅章出席了仪式。聘任仪式由冯帅章主持。



出席聘任仪式嘉宾合影

仪式伊始，暨南大学党委书记林如鹏致辞，他首先代表暨南大学对温铁军教授的加入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他表示，温铁军教授应邀加盟暨南大学，将为暨南大学乃至华南地区的乡村振兴研究带来全新的发展契机。他也非常期待温铁军教授作为乡村振兴研究院的学术带头人，推动研究院在学术研究、政策咨询、人才培养、学术交流等工作方面取得长足进步，进一步提升我校在三农问题研究领域的发展优势。未来，暨南大学将积极发挥经济学学科优势，在三农问题及乡村振兴领域产出更多“顶天立地”的研究成果，努力将研究院建成广东一流、全国领先、有国际影响力的乡村振兴智库。



暨南大学党委书记林如鹏致辞

致辞后，林如鹏为温铁军教授颁发聘书，并合影留念。温铁军教授发表就职感言，他首先对暨南大学聘任其为乡村振兴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首席研究员表示感谢，并对学校近年来在教学、科研等方面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他非常谦虚地表示，将与暨南大学的师生共同努力，共同学习和进步，作为一名知识生产者，尽可能推动知识创新产出。他认为，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学者们应该积极更新知识体系，运用最新的技术手段和学科间的交叉融合，更好地推动乡村振兴。温铁军教授表示，未来他将结合自身资源和优势与学校广泛开展业务合作和学术交流，努力实现优势互补、密切协作、共同发展。

聘任仪式结束后，温铁军教授进行了题为““三新”思想下的生态化乡村振兴”的精彩主题讲座。讲座伊始，温铁军教授指出，“以人民为中心”的“两山”是新理念的核心，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两化”深改是新格局的路径，“生态资本深化”是新阶段的内涵。接着，温铁军教授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是应对全球经济危机的压舱石。中国20多年的基本建设投资，已形成1300万亿设施资产，所以农村有几百万亿沉淀资产亟待生态化乡村振兴中激活，以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基于以上现实背景，温铁军教授提出，“两山”新理念与国内大循环新阶段要求新生产力要素扩展，推进新型县域经济的生态化。首先要通过深化城乡融合及质量效益型要素市场改革将生态空间资源价值化。接着，要通过农业六产化（农业、工业、旅游业、自然教育、生命

产业、历史传承），实现多业态的集成创新。再者，温铁军教授指出，“两化”推动了生产关系变革，空间生态资源再定价要同城乡融合战略及重构新型集体经济整合协调。最后，温铁军教授指出，“生态资源价值化”要落实在县域金融与农业两大供给侧改革相结合的措施之中。

讲座现场座无虚席，暨南大学100余名师生在现场聆听了温铁军教授的主题演讲。同时，本场讲座进行线上直播，吸引了近25万人次观看。师生们纷纷表示，温铁军教授的讲座不仅有丰富的理论内涵，还与实际案例紧密结合，将复杂的问题进行深入浅出地解释，让大家对乡村振兴这一主题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温铁军教授演讲



讲座现场座无虚席

讲座结束后，温铁军教授参观了暨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及社会调查中心，并与乡村振兴研究院、经济与社会研究院、经济学院骨干教师进行座谈交流。座谈会上，温铁军教授对教师们提出的乡村振兴的指标构建、乡村振兴和城镇化发展的关系、县域经济发展和扶贫产业的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解答和深入交流。

科研动态

科研立项

张思思副教授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后期资助项目立项

近日,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正式公示了 2021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立项名单, 共 1050 项课题获批立项。

我院副院长张思思副教授的课题《流动人口住房问题研究》获批立项, 立项情况如下:

课题名称	项目负责人	项目类别
流动人口住房问题研究	张思思	一般项目

薛森助理教授获广东省社科规划 2021 年度项目立项

近日,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正式公布了广东省社科规划 2021 年度项目立项名单, 共有 416 项课题获得立项。

我院助理教授、社会调查中心副主任薛森的课题《非典与新冠疫情对教育代际流动性的影响》获得立项, 立项情况如下:

课题名称	项目负责人	项目类别
非典与新冠疫情对教育代际流动性的影响	薛森	一般项目

论文发表



《经济研究》《经济学（季刊）》

我院副教授李书娟为第一作者的两篇合作论文正式发表于国内顶尖经济学期刊《经济研究》及《经济学（季刊）》。

发表在《经济研究》2021 年第 7 期上的文章题为“不利冲击下经济增长恢复的经验——基于中国经济目标管理实践”，合作者为陈邱惠，徐现祥。

另一篇发表在《经济学（季刊）》2021 年第 5 期的文章题为“目标引领增长”，合作者为徐现祥。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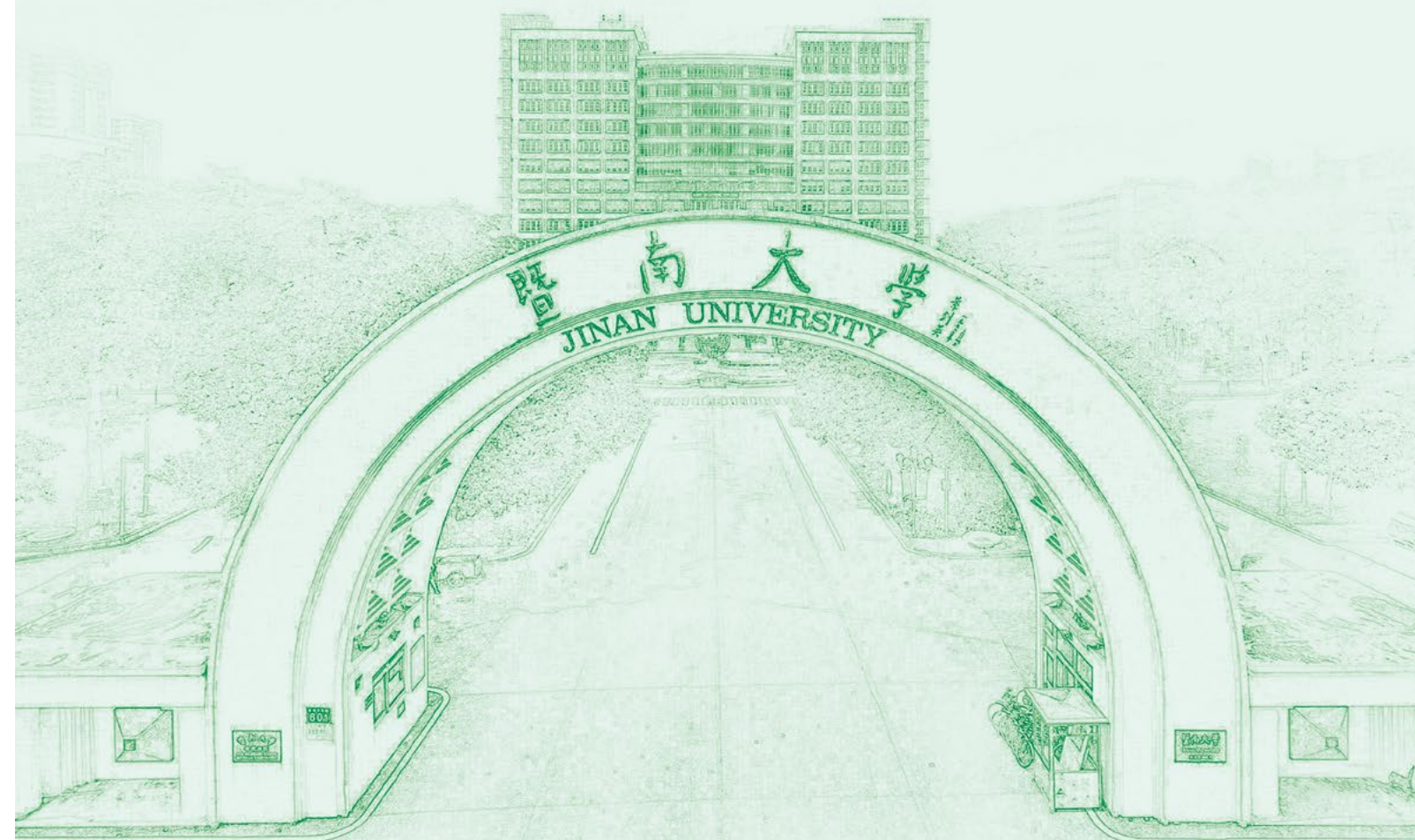
我院副教授蔡澍的合作论文“Migration and Experienced Utility of Left-behind Parents: Evidence from Rural China”（合作者：Albert Park, Winnie Yip）发表于人口经济学权威期刊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我院助理教授 Jun Hyung Kim 的合作论文“Home-Tutoring Services Assisted with Technology: Investigating the Rol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Using a Randomized Field Experiment”（合作者：Minki Kim, Do Won Kwak and Sol Lee）发表于营销领域顶级期刊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学术活动



学术会议

2021 广东乡村振兴高端论坛顺利举办



2021年12月11日，“2021广东乡村振兴高端论坛”在暨南大学成功举办。本次论坛在广东省委农办、省农业农村厅、省乡村振兴局的指导和支持下召开，由暨南大学主办，暨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承办。论坛邀请政府、学术界、企业界代表，共同讨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如何有效衔接、如何发展特色农业、如何实现共同富裕等重要议题。



暨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经济学院、
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冯帅章

本次论坛由暨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经济学院、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冯帅章主持，广东省农业农村厅督查专员方伟喜与暨南大学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夏泉致辞。全国政协委员、原广东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黄先耀出席论坛。方伟喜在致辞中提到，省委、省政府强力推动全省三农工作迈上新台阶，重农兴农格局持续强化，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乡村面貌焕然一新，乡村产业发展迈出新步伐，乡村治理全面提升。作为华南三农问题和乡村振兴研究的新高地，暨南大学在师资力量、学术交流、政策研究等领域都具有突出优势。此次论坛为来自政府、学术界、企业界的各位专家学者搭建了高水平的交流平台，是乡村振兴研究进一步落实扎根的大好时机。他热切期待各位专家学者，继续关注广东、关心广东，为广东乡村全面振兴、迈进全国第一方阵贡献更多更好的良方妙策！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督查专员方伟喜

夏泉在致辞中提到，暨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对标中央及广东省乡村振兴任务，主要研究方向包括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研究、乡村产业振兴与美丽经济体系建设研究、城乡融合与要素流动研究、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研究、乡村振兴金融支撑研究等。同时，研究院发起的广东千村调查深入广东乡村进行入户调研，从精准扶贫战略、乡村治理与乡村运行效率、农村生态环境、农村金融改革等角度出发，系统地收集广东省乡村发展的微观数据和相关信息，通过学术研究 with 政策研究的有机结合，系统总结提炼广东乡村振兴的宝贵经验，为广东乡村振兴品牌建设添砖加瓦。今后，暨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将牢记使命，根植南粤大地，承百年学术底蕴，领乡村振兴新潮，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暨南力量！



暨南大学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夏泉

致辞后，进入到主旨演讲环节。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暨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首席研究员温铁军以“重资产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为主题作主旨演讲；中国农业大学全球食物经济与政策研究院院长、联合国增强营养运动领导小组成员樊胜根以“乡村振兴的国际比较”为主题发表了精彩演讲；国

家乡村振兴局中国扶贫发展中心主任黄承伟分享了“共同富裕视野下高质量乡村振兴的理论议题与实践挑战”。最后，北京大学现代农学院院长江特聘教授、新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黄季焜就“粮食安全、特色农业和共同富裕议题”解说了相关发展思路和政策取向。



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暨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
学术委员会主席、首席研究员温铁军



中国农业大学全球食物经济与政策研究院院长、
联合国增强营养运动领导小组成员樊胜根



国家乡村振兴局中国扶贫发展中心主任黄承伟



北京大学现代农学院院长江特聘教授、
新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黄季焜

随后，暨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卢晶亮介绍《广东千村调查 2021 年研究报告》。该报告从就业与收支、农地与宅基地、农村人居环境、乡村教育与人才振兴、乡村治理、产权制度改革等方面详细介绍了 2021 年广东千村调查的最新发现。



暨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卢晶亮

11 日下午，三场圆桌论坛同步进行。三大圆桌论坛包含九大讨论主题，分别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新形势下的乡村治理、驻镇帮镇扶村的广东经验、共同富裕与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发展、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种业翻身仗与粮食安全、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生态宜居与美丽乡村建设。在圆桌论坛中，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党委书记、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刘守英，华南农业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国家农业制度与发展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罗必良，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钱文荣，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席教授、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国际院长陈志钢，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

态文明教研部副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赖德胜，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共享与发展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李实，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二级教授、中国扶贫研究院院长汪三贵，重庆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温涛，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杰出学者特聘教授程国强，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二级教授蒋和平，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仇焕广，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周应恒分别作主题发言。此外，佛山、清远、中山、梅州、茂名等地市的领导和乡村振兴第一线的工作人员，以及中国建设银行广州市分行、广东省农信社、碧桂园集团、恒建集团、卓创乡建集团等积极参与乡村振兴的知名企业的代表，都参与了主题讨论。



圆桌论坛现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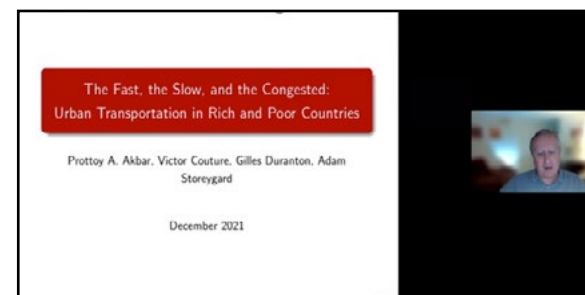
2021 暨南大学 — 新加坡管理大学 城市与区域经济学联合学术会议顺利举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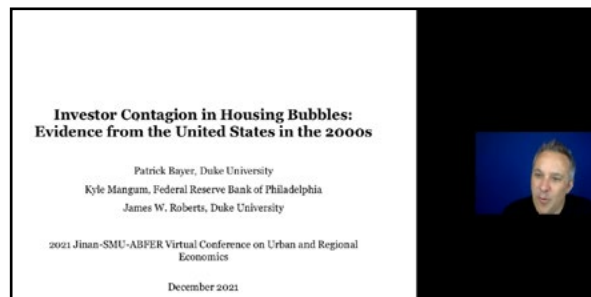
2021 年 12 月 15 日 - 17 日，“暨南大学 — 新加坡管理大学城市与区域经济学联合学术会议”在线上成功举办。本次会议由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新加坡管理大学经济学院共同主办，旨在为城市与区域经济学领域的专家学者提供研讨平台，分享最新科研成果，推进国际科研合作，携手应对共同挑战。

会议前期组委会收到近百篇高质量论文。在两天半的会议中，共设置了 18 个平行论坛，来自剑桥大学、北京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世界银行、新加坡国立大学、新加坡管理大学、英属哥伦比亚大学、香港大学、暨南大学等全球 30 所高校及机构的 55 名学者就城市发展、资源错配、房屋交易、区位导向性政策、环境、移民、土地、交通、社会不平等、劳动力市场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此外，本次会议邀请了 6 名主旨演讲嘉宾，包括宾夕法尼亚大学 Gilles Duranton 教授、方汉明教授，杜克大学 Patrick Bayer 教授，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Gabriel Ahlfeldt 教授以及多伦多大学 Stephan Heblich 教授、Nathaniel Baum-Snow 教授。韩璐教授被邀请担任 Master Class 的嘉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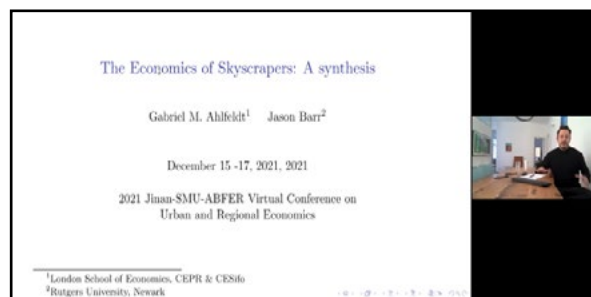
Gilles Duranton 教授主旨演讲：The Fast, the Slow, and the Congested: Urban Transportation in Rich and Poor Countri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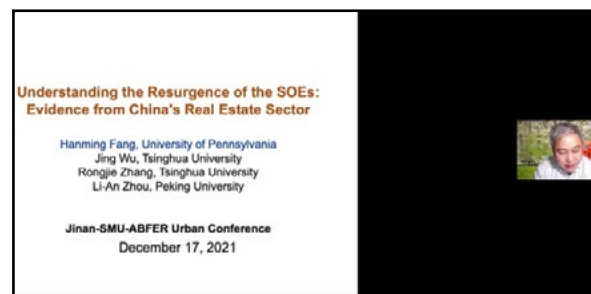
Patrick Bayer 教授主旨演讲: Investor Contagion in Housing Bubbles: Evidenc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2000s



Nathaniel Baum-Snow 教授主旨演讲: Filtering in Commercial Real Estat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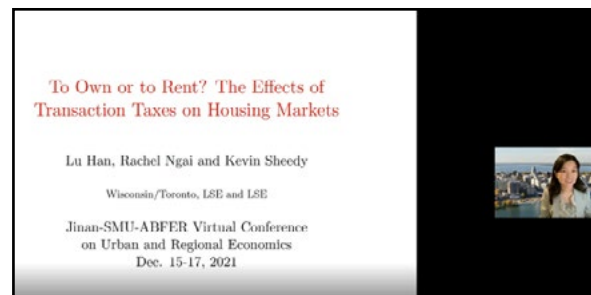
Gabriel Ahlfeldt 教授主旨演讲: The Economics of Skyscrapers: A Synthesis



方汉明教授主旨演讲: Understanding the Resurgence of the SOEs: Evidence from China's Real Estate Secto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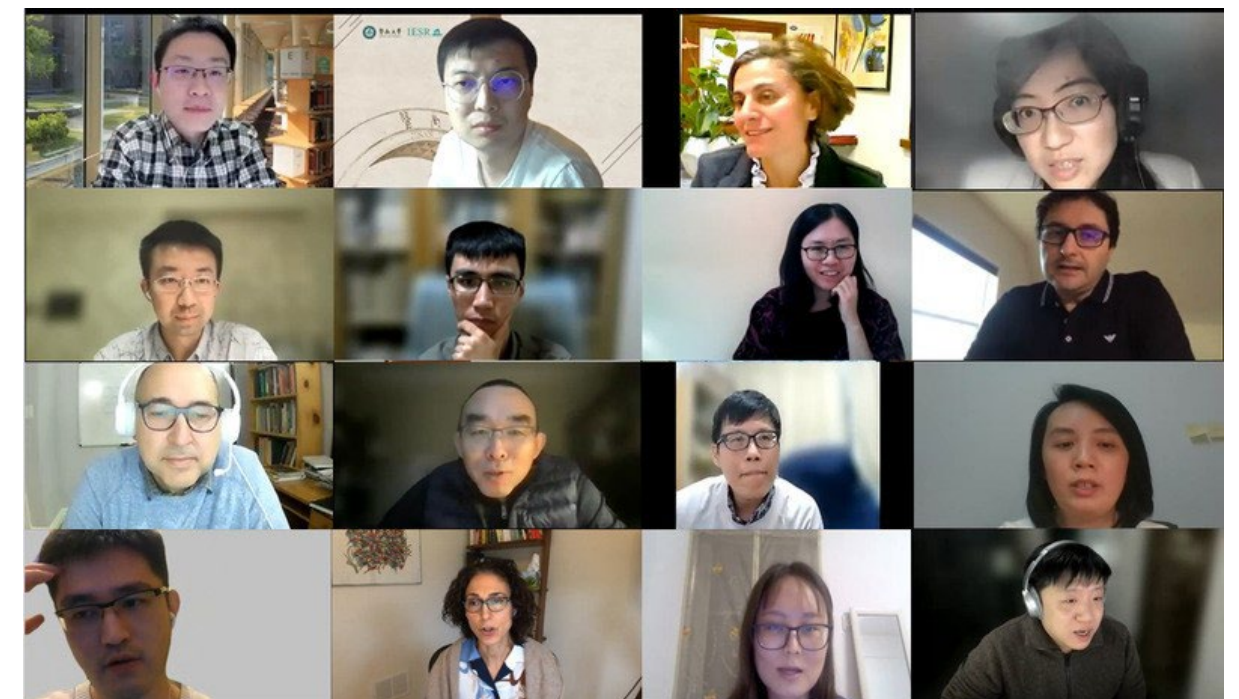
Stephan Heblich 教授主旨演讲: Industrial Clusters in the Long Run: Evidence from Million-Rouble Plants in China



韩璐教授 Master Class: To Own or to Rent? The Effects of Transaction Taxes on Housing Markets

本次会议因疫情防控原因通过线上进行，但高质量主旨演讲、课程及会议论文，精心的会议设计与安排获得了与会者的高度评价。这是我院首次与新加坡管理大学共同举办城市与区域经济学会议。此后，学院将继续加强与世界顶级院校及机构的合作，组织更多高质量的学术会议。

2021 微观计量经济学研讨会成功举办



2021年12月11-12日，2021微观计量经济学研讨会于线上举办。该系列活动自2018年起由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微观计量经济学中心主办，今年邀请了来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康奈尔大学、波士顿大学、多伦多大学、香港城市大学与暨南大学等高校微观计量领域学者分享最新研究成果，就该领域重点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研讨会共吸引了全球50余名参会者。

微观计量经济学中心重点关注消费者、企业等微观个体的行为和政策效应分析的模型方法研究和应用，积极探索如何将微观经济理论和计量方法结合起来，鼓励计量经济学、应用微观经济学、统计学、计算机科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学科间的交叉研究。中心与国内外经济学

者紧密联系，中心成员来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芝加哥大学、耶鲁大学、威斯康星大学、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等知名学府，他们定期来访中心，为促进中心成员的研究提供思路 and 方向参考。中心已开展一系列学术讲座、学术会议及专题研讨会、短期课程，力争成为中国微观计量领域领先的研究机构。

我院联合经济学院举办 2022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报交流会



为进一步推进 2022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报组织工作，提升国家级项目申报数量与质量，提高立项率。11 月 24 日，我院联合经济学院成功举办“经济学科 2022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报交流会”。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经济学院院长冯帅章教授出席会议并作动员讲话，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副教授蔡澍、经济学院教授何凌云、经济学院副院长郑贤副教授（按分享顺序排序）作申报经验分享报告。会议由研究院副院长卢晶亮主持，研究院院长助理谢斌、两院拟申报 2022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人员等近 40 人参加会议。

会议伊始，卢晶亮副院长对参加交流会的老师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会议背景以及三位分享申报经验的专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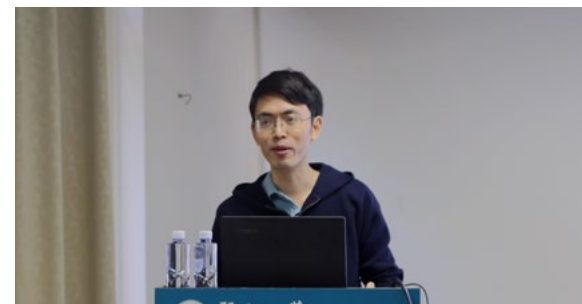
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卢晶亮副院长

随后冯帅章院长进行了动员讲话，他强调国家级科研项目的重要性，鼓励与会青年教师积极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报。他激励大家发扬持之以恒的精神，提早准备、反复打磨、不断提高申请书质量，并预祝两院 2022 年度国家基金项目取得更好的成绩。



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经济学院院长冯帅章教授

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副教授蔡澍结合自身的基金申报经历，分享了自己对基金申报的感悟。他分别从基金选题、标题锤炼、研究内容构建、文献梳理等方面进行分享。



经济与社会研究院蔡澍副教授

结合自己丰富的基金评审与申报经验，经济学院何凌云教授从基金评审人的角度分享了如何增加基金申请成功率的心得体会。他分别从基金评审要点、常见问题、选题与写作技巧等方面进行详细分享。



经济学院何凌云教授

最后，经济学院副院长郑贤副教授分享了自己的申报经验，为现场的年轻教师提出了宝贵建议。会议随后进入了热烈的现场互动环节，与会专家与年轻教师进行了深入探讨与交流。



经济学院郑贤副院长

此次交流会对动员两院教师积极申报国家基金项目，提高申报质量以及确保 2022 年度国家基金项目申请工作的顺利开展具有重要的作用。近年来，我院一直积极响应学校安排，高度重视国家基金项目的组织申报工作，接下来我院将组织开展基金申报评审会、一对一帮扶专家把关申报书等工作，确保 2022 年度国家基金项目的申报工作取得实效。

暨南论道

北大汇丰商学院许志伟副教授
谈资产泡沫最优救助政策

2021年10月19日下午，经济与社会研究院、经济学院于中惠楼323会议室共同举办“暨南论道”公开系列讲座第33期。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许志伟副教授受邀担任本期演讲嘉宾。许志伟老师主要从事中国宏观经济、宏观金融、货币政策、经济波动等领域的教学和研究。在本期讲座中，许志伟老师分享了题为“Bubbly Bailout”的研究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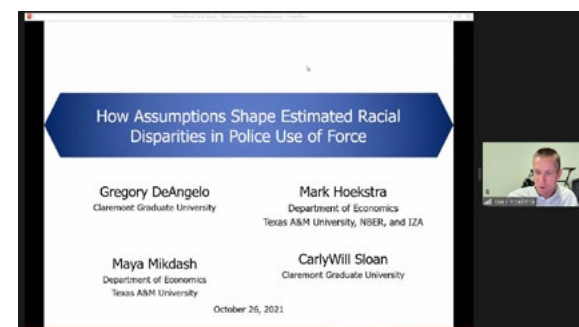
许志伟老师首先以房地产泡沫和股市泡沫为例，阐述了泡沫存在的正面作用和反面作用：一方面，由于金融市场的不完备性，企业可能面临着流动性约束。这将导致企业无法及时把握有效的投资机会而丧失经济效率。此时，如果企业拥有一定的泡沫资产，则可以将其及时变现而帮助企业把握有效的投资机会而提升经济效率。然而，另一方面，资产泡沫很容易受到市场情绪和资源消耗的影响。泡沫破裂的系统性风险既会导致资产价格波动，也会导致经济波动。区别于传统文献中的泡沫，许志伟老师及其合作者在文章中运用了泡沫会消耗实体经济资源的设定，使得泡沫产生了另一层负面影响。其次，许志伟老师探讨了政府在其中的调控作用。政府可以对特定类型的泡沫进行背书；也可以对背书的程度进行选

择，如泡沫破裂了则政府担保百分之多少。类似泡沫存在的正反作用，对于特定的泡沫，政府背书程度的加大也会存在正反作用：一方面，微观个体会认为泡沫资产风险更低而购买更多的泡沫资产而为企业增加更多的流动性，进而使其能更有效的把握投资机会；另一方面，无论是对于政府还是微观个体，同时也挤出了用于实体经济的资源，并增加了整体经济的波动性。基于正反两方面的作用，政府存在一个最优的背书政策来权衡两方面的影响。

为了更好的描述以上所阐述的经济现象，许志伟老师首先基于离散时间、无穷期数、不完全金融市场和多方“代理人”构建了理论模型。在竞争性均衡时发现，政府的背书程度如果低于某个阈值，泡沫就不会出现。该阈值随泡沫破裂的概率递增，随公司持有泡沫资产的意愿而递减。其次，许志伟老师还构建了相关的理论模型对整体经济的福利进行了分析，发现如果持有泡沫资产是唯一解决流动性约束的方法，整体经济的福利与政府对资产泡沫的背书程度呈一个倒U型曲线。也就是说，政府为了应对前面所阐述的权衡（tradeoff），将会有有一个最优的政策（optimal policy），而使整体经济的福利达到最优。

讲座最后，许志伟老师与听众积极互动，师生的提问都得到了他细致且有说服力的回答，与会师生纷纷表示受益匪浅。

美国德州农工大学 Mark Hoekstra 教授谈不同基准假设如何影响警察执法暴力中的种族差异估计系数



北京时间2021年10月27日上午，美国德州农工大学 Mark Hoekstra 教授受我院暨南论道活动邀请，于线上平台作题为“How Assumptions Shape Estimated Racial Disparities in Police Use of Force”的主题讲座。我院院长冯帅章教授主持了本期讲座。

Mark Hoekstra 是美国德州农工大学经济学教授，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IZA 劳动经济学研究院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劳动经济学。其于2012年获得 IZA 青年劳动经济学家奖，目前担任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及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副主编。

在美国，由于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对少数族裔的歧视，和美国警察在奴隶和歧视黑人的历史中扮演的不光彩角色。警察执法过程中的种族问题长期受到关注。也有人认为并非种族歧视导致暴力执法，比如也有可能是因为警察中存在少量害群之马。学界对警察种族歧视执法问题开展的实证研究存在不足，包括基准设置问题（Benchmarking Problem）和选择性偏差（Selection）。选择性偏差指执法过程中的风险会因为警察和执法市民的族裔而不同。基准设置问题指研究中

通常只关注到了发生暴力或逮捕的执法过程，而并不是所有的执法都被纳入研究样本中。比如，有人说黑人因为警察执法过程中的暴力行为死亡的概率是白人的2.5倍，但是这种说法忽略了警察的执法对象中黑人与白人的比例，以及对黑人与白人的执法过程的危险程度是否相当等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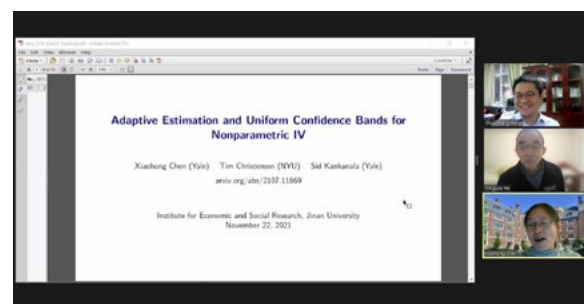
为了解决以上问题，Mark Hoekstra 教授与合作者使用911报警系统的数据进行分析。报警系统中记录了各种类型的案件，和警察在执法中将会面对的情况，并将警察随机分配到社区处理案件。通过双重差分模型估计白人警察和黑人警察在不同种族背景的社区的执法差异。研究结果显示，在未控制协变量的模型中，白人警察在执法过程中的暴力行为显著随着社区中的黑人比例增加，且高于黑人警察。但是在控制了协变量之后，两个族裔的警察的差异消失，暴力行为的比例也不再随着社区黑人比例变化。研究发现，在不同基准假设下，白人警察变量与执法暴力的估计系数从正向显著转变成负向显著或无法拒绝零假设。因此，Mark Hoekstra 教授建议研究人员在开展实证研究时，应该谨慎处理对照基准组的设定。

在此次讲座中，Mark Hoekstra 教授与参会人员积极互动，对参会人员的提问都作了详细解答，讲座气氛热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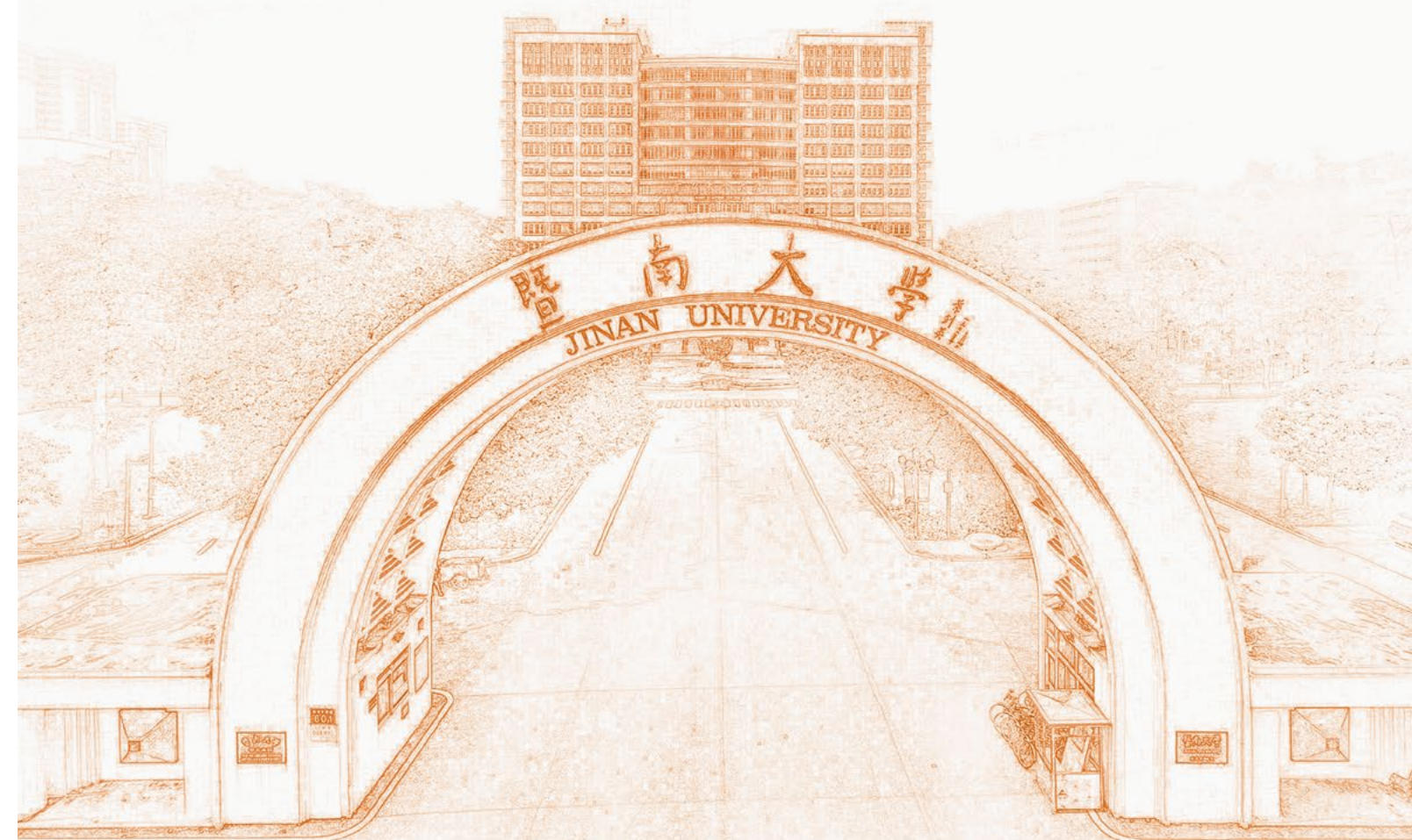
美国耶鲁大学陈晓红教授：Adaptive Estimation and Uniform Confidence Bands for Nonparametric IV



2021年11月23日上午9点，我院“暨南论道”公开系列讲座第35期于线上顺利举办，美国耶鲁大学陈晓红教授受邀担任本期演讲嘉宾。陈晓红现任美国耶鲁大学 Malcolm K. Brachman 经济学教授，Journal of Econometrics 主编。2007年入选世界计量经济学会院士，2019年入选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是计量经济学领域顶尖的学者之一。讲座由我院院长冯帅章教授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胡颖尧教授共同主持。



思想 聚焦



乡村振兴专题

种业发展将助力农业应对气候变化



作者：崔潇濛（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副教授）

气候变化对全球农业生产与粮食安全的影响深远。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最新发布的第六次报告显示，相比于 1850-1900 年的基准水平，全球平均 1.5°C 变暖将带来 4.1 倍多的极端高温事件和 2 倍多的农业与生态干旱事件。而当变暖水平达到 2°C，这两个数字将分别增加至 5.6 倍和 2.4 倍。在过去二十年中，有大量研究基于不同的学科方法，就气候变化对农业的影响

进行了估计与预测。研究显示，气候变化将在整体上对全球主粮供给造成巨大压力。我国学者领衔的一项研究表明，在现有技术条件下，平均温度每上升 1°C，全球小麦、水稻、玉米、大豆将减产 5% 左右，且减产威胁在部分中低纬度地区尤其突出。

我国农业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挑战十分严峻。《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表明，我国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和影响显著区。一方面，持续的升温、降水分布变化及极端气象事件增加将直接影响农作物的生产供给；另一方面，人口增长、城乡结构变化和随之而来的消费升级又将进一步推高对农产品的总需求。在这一供需矛盾的大背景下，我国农业同时面临着粮食自给与人均淡水、耕地紧缺的政策与资源双重约束。这无疑更加大了我国农业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难度与紧迫性。

回望全球农业的发展进程，以育种为代表的生物科技创新使得农业生产得以不断突破原有的资源环境限制条件，进而能够持续满足不断增长的全球食物需求。著名经济史学家奥姆斯特德和罗迪的一项研究曾指出，从 1839 年至 1929 年间，美国小麦的生长区域向北扩张了近千公里，向西扩张了近两千。这意味着小麦能在比原先平均气温低 5°C、平均降水减半的地区生长。类似的扩张也出现在玉米等其他主要作物上。支撑这一系列扩张的动力则来自于近一个世纪里农学家在生物育种方面的不断努力。自二十世纪后半叶开始，“绿色革命”浪潮进一步推动了生物育种的快速发展，不同作物的不同品种在不同地区的快速迭代与更新也使得农业生产能够进一步突破边界，表现出更强的环境适应能力。这样的历史经验也预示着生物育种在农业应对气候变化当中举足轻重的作用。

近日，农业农村部发文称，中央即将下发《种业振兴行动方案》，对我国种业发展作出进一步重要部署。将种业发展上升至战略高度对于我国农业应对为未来气候变化挑战将形成巨大助力。我国的制度优势和在生物育种方面的前期积累也有利于更好地发挥种业发展在应对气候变化当中的作用。

以种业发展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培育出对未来气候条件更具适应性（如耐旱、耐高温）的品种。然而，对同一类作物而言，并不存在放在哪里都能种的种子。品种的培育必须要能适应一个地区小环境内具体的水土光热条件，单纯的良种引进无法直接“落地生根”。这种生物性方面的要求意味着全国各地需要根据自身的资源环境情况及气候变化的特点，结合自身的农业生产内容，因地制宜地进行品种培育。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形成成熟的农业科技研发与技术推广体系，覆盖国家、省、市、县、乡多个层级，在推动各地农业技术进步、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的科技人才和“产学研”联动经验。这些积累为“因地制宜”发展种业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并为各地结合当地气候变化特征进行有针对性的部署创造了条件。在充分利用这一科研和推广体系的前提下，进一步对气象与农业部门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将有助于全国各地种业发展具体工作的展开。

自 2000 年《种子法》颁布以来，我国种业和种子公司的发展逐渐完全褪去“计划经济”的色彩，自主研发的积极性与活力得到充分释放。然而，仍应注意到，种业的发展不是单纯的商业活动，由于涉及到粮食安全，它同时具有极强的公共品属性。尤其在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政府及相关部门仍需深度参与种业发展的方向制定，确保种业发展的思路具有足够的前瞻性、种业发展的成果具有充分的普惠性。

在过去三四十年间，欧美发达国家在农业科技研发投入中对商业化企业的过度依赖已暴露出诸多问题。由于企业最终对股东负责，其研发对象通常聚焦于具有广阔市场和巨大回报的特定种质产品。一方面，这无法顾及农业全行业多方位的需求，尤其是相对弱势的农业生产者的需求。另一方面，优势品种的相对集中化、单一化甚至会加大部分地区农业生态的脆弱性，进而加剧气候变化对农业带来的负面影响。近年来，农业经济学领域已有研究表明，在商业激励的引导下，美国主要作物在育种和采用上更为追求高产而相对忽略作物对高温、干旱的耐受性，进一步增加了气候变化下的农业风险。

气候变化是本世纪人类面对的最大挑战之一。气候变化对农业的影响将直接影响人类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国对种业振兴的战略要求和对种业发展的大力投入无疑将助力农业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严峻挑战。在几十年来农业蓬勃发展的基础上，我国有能力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因地制宜地推进育种研发推广，将种业振兴和气候韧性农业的建设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本文首发在南方农村报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亟待破解三个难题



据显示，全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 4.3 万元和 1.7 万元。显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依然较大。此外，教育水平的差距还会导致不平等的代际传递，目前农村居民的代际收入流动性显著低于城市居民。提高农村人口的教育水平是从根本上缓解城乡间的不平等，也是促进城乡均等化发展的治本之策。

随着农村教育投入的逐年增加，虽然在“量”的层面上已经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成效，许多农村地区的办学条件也得到了明显的提升，但是在“质”的方面上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性转变。一是由于农村学校的特殊地理分布。国家关于农村学校布局调整，强调的是首先要关注学生受教育权利的实现及受教育机会的获得。然而，政策传递到一些地方，却产生了不小的变形，许多地方政府把目标定位在“通过扩大校均规模实现资源最优化”。如此一来，相比家门口的“小而美”学校，过度集中带来学生上学时间和经济方面的成本增加，可能得不偿失。二是师资之类的“软件”建设急需跟上。不少乡村学校在教师招聘方面存在“招不到、留不住”的困局，缺乏优秀的师资。在这方面，政策应着力通过提高待遇、支教交流、轮岗培训、评优评奖以及远程教育等机制，确保农村学校的师资质量和教育水平。

留守少年儿童教育问题不仅仅是教育方面的问题，而且是我国社会发展阶段中的一个特殊产物，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一方面，父母外出务工可能导致留守少年儿童在心理健康等非认知能力上发生障碍，并带来长期的不利影响。另一方面，流动少年儿童在流入地仍然面临不能与户籍少年儿童同等机会接受义务教育的困境。鉴于此，流入地政府可以通过将流动人口教育需求纳入公共服务规划、兴建更多公办学校、政府出资购买民办学校学位的方式加大普惠教育供给，破除户籍制度造成的壁垒，营造一个关爱农村留守少年儿童的社会环境，加强并完善对农村留守少年儿童的教育和监护体系。

作者：冯师章（暨南大学经济学院、经济与社会研究院、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教授）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而乡村振兴战略正是破解我国“三农”问题的金钥匙。针对当前在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遇到的一些现实问题，通过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实施，精准识别并满足不同年龄阶段农村人口最关键的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其中，教育、就业和养老，是我们亟待破解的难题。

良好的教育是提升农村人口整体素质的关键因素之一

受教育程度是决定人口素质的重要因素，且受教育水平与居民收入水平密切相关。据 2020 年国家统计局数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是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对于青壮年人来说，无论是生活在城市还是乡村，关键的需求是高质量的就业机会。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与 2010 年相比，城镇人口增加 23642 万人，乡村人口减少 16436 万人，城镇人口比重上升 14.21 个百分点。农村人口进城在过去 40 年内成为中国经济增长，人民收入增加的重要推手。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是建设现代农业、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也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更是增加农民收入的主要途径之一。目前，非户籍人口在城市就业市场中还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就业质量较低，在工资水平、保障水平方面都有待提高。与此同时，流入地政府还应积极推进非户籍人口的“市民化”待遇，使得这些从农村转移过来的非户籍人口能够在各方面融入城市，最终实现完全的城镇化。同时，县域经济是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的结合部，是农村居民获得非农就业机会的主要地域。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加快特别是产业振兴的推进，也将为农村劳动力年龄人口提供越来越多的高质量就业机会。县域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可以为农村居民就地提供大量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的机会。

综上所述，农村劳动转移就业是一个社会发展转型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可以说，随着农村人口“老龄化”速度的不断加快，农村人口结构中青壮年数量的不断减少，对农村的人口结构和就业选择产生极大的影响。因此，我国应该对农村人口结构变化的规律和特征进行有效的分析，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加大对农业生产的扶持力度，从而推动农村农业的稳定发展，它关系到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农村深化改革以及产业化发展转变的大局。所以，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问题，我们要从乡村振兴战略的高度给予重视，不断总结经验 and 做法，使农村劳动力能快速有效地实现更高质量的转移就业。

农村养老服务须纳入到乡村振兴战略的全局上来统筹

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老龄化水平城乡差异明显：从全国看，乡村 60 岁、65 岁及以上老人的比重分别为 23.81%、17.72%，比城镇分别高出 7.99、6.61 个百分点。和六普数据比较，农村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14.98%）上升约 8 个百分点，比六普城乡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差距（3.19%）高出 4.8 个百分点。可以看出，城乡老龄化差距正在不断拉大，乡村老龄化程度更高、更严重。因此，农村养老问题，需要纳入到乡村振兴战略的全局来统筹。

农村老龄人口大致可分为两个不同类别的群体。第一类是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入城务工的乡城流动人口，随着年龄增长与城市就业困难开始“落叶归根”。第二类是一直在农村务农的农村老龄居民。这两个群体都面临非常严峻的医疗健康方面的挑战。对于前者而言，他们在城市务工多年，部分人在安监、职业防护不达标的环境下从事劳动，面临诸如尘肺病、工伤等职业病的困扰，又未能充分享受到城市的社会福利制度保障。对于后者而言，他们常年从事繁重的农业生产劳动所致的慢性疾病，以及农村相对较差的公共卫生水平，都对他们的健康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虽然当前农村已经建立起广覆盖、保基本的医疗保障体制，但保障水平与医疗服务的质量还比较低。而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外流导致农村的“空巢老人”“留守老人”逐年增加，对传统的养老格局形成巨大挑战。随着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推进以及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趋势的继续，留守农村的老龄人口容易陷入“老无所养”的窘境。

有鉴于此，在政府的支持下，结合农村“熟人社会”的特质，社区养老模式或许是农村养老可探索的有益思路。较城市社区而言，农村的社区互助养老除了具备天然优势，可以发挥邻里互助、熟人互助的作用外，还可以通过组建老人互助小组、老年协会、时间银行等形式，建设农村幸福院、养老大院等互助养老服务设施，打造农村社区的互助养老体系。这样一来，农村的老年人可

以在引导下相互照顾，开展、参与各类常规体检、组织活动、节日慰问、治安联防、紧急救助甚至生病丧葬方面的照料活动。

此外，在盘活农村集体资产、建设美丽乡村与“三清三拆”等政策的基础上，还可以充分利用村庄的集体资产以及有利的社区环境，例如村庄的旧学校、旧厂房等集体资产进行养老院的改建，并依托村集体经济收入对养老院开支进行补贴，包括聘请专业化的看护人员和医护人员，对老人健康做到及时监测精准对接。同时，与养老相关的社会服务下乡，也能依托这些养老平台开展服务，容易形成规模经济与平台效应。只有从“硬”的资金保障和“软”的服务到位两方面同时着手，才能从根本上全面解决农村老龄人口的养老问题。

“暨南乡村谈”：农村养老路在何方

编者按：

暨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视频号“暨南-乡村振兴”将推出系列智库访谈节目《暨南乡村谈》，节目聚焦乡村振兴话题，进行深入浅出地解读和阐述，致力于让更多人了解乡村振兴，讲好中国乡村振兴故事。

在第四期节目，我们聚焦农村养老话题，共同探讨农村老年人面临的养老问题。我们邀请到暨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专职研究员、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副教授李书娟，暨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副教授蔡澍，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杨哲进行解读。

农村养老现状

近年来，我国农村老年人口的生活状况是什么样的？农村养老模式（养老方式）是什么样的？

总之，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只有始终以人民为中心，让不同年龄农村人口最重要、最迫切的需求和问题都能得到妥善解决，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才能更有成效，更见实效。

注：本文首发在《学习时报》，《学习时报》于1999年9月创刊，中共中央党校主办，面向全国，服务全党，以各级党政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是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全党唯一专门讲学习的报纸。



李书娟：从全国的总体情况来看，早在2001年，我们国家就开始进入老龄社会了。根据2020年的数据，我们总人口大概是14亿，65岁以上人口的数量大概是1.9亿，占总人口比重约17%，而“老龄化社会”的国际标准是“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7%”，很显然，我们现在已经是一个典型的老龄化社会。

农村的老龄化情况可能更为严峻。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60岁以上人口占农村人口的比重达到了大概24%，这个数值是很高的，比城镇的相应数据高了8%左右。所以，农村的养老问题可能比城镇更严峻。



蔡澍：在经济层面，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农村老人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改善，虽然仍然存在农村老年贫困的问题，但总体上来说，农村老年人的物质生活还是得到了一定改善。

在精神层面上，其实农村老人面临着相当大的挑战，主要是沟通交流、子女陪伴这方面。随着青壮年劳动力的外出务工，很多村子里人很少，留下来的大多是老人和小孩，老人在家里主要承担了照顾小孩的责任。因为缺少了子女，所以他们要承担更多的家务活和农活，和别人的交流相对也来说减少了，显得很孤独。如果这种孤独的负面情绪，无法通过沟通交流等途径得到有效的解决，就会成为非常严峻的问题，比城市老人可能面临的情绪问题更严重。

在农村地区，目前主要的养老模式是家庭养老。以前我们常说“养儿防老”，在农村来说尤其如此，家庭在赡养老人方面起到了绝对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子女外出务工，家庭养老很大程度上变成了经济养老，子女可能会给家里寄钱，他们可以给老人提供一定的物质基础。但是养老并不是单纯的物质支撑就足够，还需要精神的慰藉，这方面是相当缺乏的。所以目前我国的农村养老不能仅仅依赖于家庭养老的模式，社区养老也应当发挥积极的作用。我之前做过一些研究，研究参与社会活动对老年人的影响。研究发现，参加社会活动的老人，相对于没有参加社会活动的老人，精气神更足了，认知

能力的衰退也显著减缓了，所以我认为，社区组织一些适合老年人的活动，丰富他们的文娱生活，是非常必要的。比如广场舞、琴棋书画。其实重要的不是活动内容，而是和其他人交流接触，参与到社会互动中去，这是最重要的。在活动过程中，相比起一个人在家，老年人与外界产生了更多情感的互动和接触，这种情感的交流是更为重要的。

机构养老也是养老模式之一，即养老院。在农村地区，以前在养老院的老人大多数是孤寡老人或者五保户。但现在来看，之前的独生子女政策使得农村家庭里的孩子偏少，而且很多子女外出务工，留在家里的老人跟孤寡老人也没有太大区别，虽然他们在经济上有子女的支持，但是他们身边没有孩子陪伴。我认为，农村的机构养老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孤寡老人，也应该拓展到更广泛的群体，成为农村地区养老模式的重要补充。

我爸爸就是一位农村基层养老院的负责人，我回家的话会经常去他的养老院，了解那些老人的生活状况。他们大多都是五保户或者孤寡老人，因为子女不在身边而进入养老院的还很少。养老观念是因素之一，大多数老人会觉得自己有儿女，去了养老院会遭到其他人议论；可能子女也不愿意让他们去。而养老机构的条件是另一个因素，农村地区正规、服务好、硬件软件完备的养老机构实际上是比较少的。电视剧《幸福院》讲的就是养老的故事，一帮有子女的老人想一起搬到幸福院住，但子女都不愿意让他们去，可他们觉得志趣相投的老人们住在一起很开心。



杨哲：根据2020年的全国人口普查，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大概有2.6亿，这其中有一半，约1.3亿人

居住在农村，农村的老龄化率达到了 23.8%，比城镇的老龄化率高了大概 8 个百分点。目前我国农村养老的主要模式是居家养老。农村养老的主要困难包括经济保障难、照料护理难、精神关爱难。

我认为，农村老年人的养老状况可以根据子女的不同情况进行划分。

第一类是少数跟随子女进城居住的农村老年人。他们的子女在自身完成了市民化之后，有余力让老人也完成市民化。这一类老年人所占比例较少，实际上也不属于农村老龄人口了，他们在养老上的困难相对来说比较少。

第二类是子女外出打工的农村老年人。他们的子女比较忙，平时很难有空回来照料老人。子女们虽然能给予老人生活补贴，但还是缺乏照料陪伴老人的时间。

第三类是与子女一起居住在农村的老年人。这类子女没有外出打工，往往整体收入水平不高，照料老人时，可能在经济上力不从心。另外，还有一些子女由于家产继承、家庭矛盾，或者教育水平低、缺乏法律意识、道德观念淡薄等原因，没有尽到赡养老人的义务。

如果老人有多名子女，那么根据经济学常识，子女们会根据比较优势，分工照料老人，比如有的照料老人的生活起居，有的提供生活费用等等。我们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的马森老师有一篇发表在人口学期刊上的研究，他们发现，农村的老年人在需要子女照料的时候，往往选择和学历相对较低的子女共同居住，而非学历比较高的子女。按照比较优势分工的话，有的子女擅长挣钱，但是比较忙，没有空照料老人；有的子女有空闲，但是收入并不高。如果这两类子女能够配合照顾老人，比如有空闲的子女留在老人身边，带老人看病，在外打工的子女多承担养老费用，这样就能更好地照料老人。

2014 年，国家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体系，以实现保障老年人的生活。您认为目前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体系存在哪些问题？还可以采取哪些措施保障老年人生活？

李书娟：农村的养老问题更加严峻，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农村人均收入和城镇人均收入的差距问题，“严峻”也主要体现在这一点上。根据 2020 年的统计数据，农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大概 17000 元，城镇相应的数据是 44000 元，相比之下，农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城镇的不到 40%，二者收入差距是比较大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养老的基础，因为农村养老主要是在家庭里面，而且农村的老人大部分是没有自己的收入的，只能依靠子女的接济，这些钱大部分还要花在家庭建设、下一代教育上，所以分配到养老方面可能就更少了。也就是说，农村养老的物质保障是不够理想的，特别是孤寡老人，可能是最困难的一个群体。

第二个方面，是养老制度、养老体系的不够完善。我们农村的养老制度建设启动是比较晚的。2009 年，国家启动了一个大型的养老金计划，即“新农保”，农村人口可以按不同档次购买养老保险，但可能有一部分人不愿意购买保险。国家也会给予 60 岁以上的农民每月 55 元的基础养老金。55 块钱确实听起来比较少，但是有学者进行了专门研究，发现这 55 块钱还是有一些作用的，尤其是对农村里收入特别低的那部分农民，55 块钱对他们解决日常的温饱还是起到了一定作用。当然，目前总体的情况依然不大理想，低收入老年农民的生活质量还是较差。2019 年的数据显示，在农村，老年人每月人均养老金是 162 元，但是城镇职工的每月人均养老金大概是 3333 元，二者有几十倍的差距。

为什么谈农村养老的问题，要谈到人均可支配收入，还有养老保险这两方面呢？事实上这两方面，落到我们老百姓身上都是钱。我认为要解决养老问题最本质的就是，要靠钱，因为老年人的物质保障、医疗保障都是需要资金的，包括现在出现的多种多样的养老方式，比如机构养老、社区养老等等，也都需要一定费用。以前农村里的老人是不大愿意进福利院的，觉得福利院条件不好，但是现在有些名字好听一点的福利院，比如叫“幸福院”的，里面的条件可能更好，但是要交的费用也会更高。如果要提高养老的水平，必须是要有资金的支持。

我认为农村的养老问题，本质上还是农村的发展问题，是如何缩小城乡差距的问题。有些地区城中村中的集

体经济经营得很好，那么村民个人的收入也较高，养老保障方面就能做得比较好，村民们都能买额度比较高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60 岁、65 岁的老人每个月至少能领五六千块钱。所以还是发展最重要。

这样看来，农村养老的问题就不是短时期内能够解决的问题了。我们也不能因此灰心，因为我们国家近些年已经非常关注这些问题了：我们在精准扶贫上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乡村振兴则在精准扶贫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农村，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还有共同富裕，这其中的逻辑都是一致的。如何实现共同富裕也不是一个新问题，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就提出了“共同富裕”，即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后实现共同富裕。我们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实现了前面“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目标，那么党和政府现在就开始着手实现第二个目标，即共同富裕。从历史经验来看，共同富裕的目标是党和政府给我们的承诺，这个承诺是可信的，终有一日会兑现，只是可能无法在短期内实现而已。

总的来说，目前我们国家的农村养老问题迫切需要解决，这关系到乡村振兴，甚至是共同富裕的远大目标。要彻底解决农村养老的问题，事实上还是要靠乡村振兴。为什么城市里的养老问题没有这么严峻，是因为城市的发展相比农村，显然不在同一个水平层次，城市里老年人的收入、医疗等方面，都是更有保障的。

杨哲：在发达国家，养老机构已经十分多样且成熟，但子女的看护和陪伴依然是非常重要的。之前我留学美国时，就曾经问过学院的一些教授：如果他们老年有足够的资金入住高档的、长期护理的老年公寓，是不是子女就没有养老的负担了？他们的回答非常出乎我的意料，他们说就算条件再好、再有钱，住的地方再高档，看病的时候，子女在不在旁边，老人的生活质量是有着天壤之别的。很多事情老年人无法自己解决，但旁人并不会尽心尽力帮忙，他们只是拿工资做事，并不是在真正地照顾老人，如果这时候子女没有陪伴在身边，老人会觉得缺乏关爱，这对老人来说是非常不好的体验。所以说，尽快实现农村人口的市民化，让更多现在外出打工的子女一辈到了老年阶段，不用再面临目前他们的父辈正在经历的农村养老困境，我觉得这是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养老问题的最好办法。

农村养老前景

2019 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您认为在未来，农村养老有哪些潜在的发展模式？有哪些优劣？适合什么条件？

李书娟：“时间银行”就是一种积极的尝试。按时间银行的模式，在我还比较年轻的时候，我可以去照料社区里一些没有人照顾的老人，我照料老人的时长会像存钱一样储蓄在时间银行里，等到我老的时候，我就可以使用这些时间，会有其他人花时间来照料我。时间银行是一种比较好的尝试，但是在农村基本上很少见，农村主要还是靠子女照顾。有些子女也不一定能照顾得很好，他们可能不在家，老家只有老人，有时候老人还要带孙子，而且农村也没有“退休”的说法，只要你还能动还能干，都是在干活，这也是比较无奈的。

未来，城市的专业养老机构可能会成为农村养老发展的趋势。因为现在农村比较多的年轻人，都会去城镇发展，当留在农村家里的老人得不到照顾的时候，送到专业的养老机构就是一个比较好的办法。

众所周知，我国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那么相比城市，我国农村老龄化率如何？就是未来会如何发展，你认为这对农村养老有哪些影响？可以采取哪些政策应对农村老龄化的挑战？

蔡澍：根据 2019 年联合国的世界人口展望报告，2019 年全世界的人口老龄化率约 9%，预计到 2050 年将上升到 16%。而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率，比世界平均水平还要严峻，在 2019 年是 11.6%，到了 2030 年，这个数字将接近 20%，根据人口学家的预测，中国人口老龄化率到本世纪中叶，即 2050 年左右，将达到近 25%，每四个人当中，就会有一个是 65 岁或以上的老人。在农村，这个问题就更为突出，农村的人口老龄化率比城市更严重。

人口老龄化对于农村来说是更严峻的挑战。一方面是农村人口老龄化比城市更严重。另一方面是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虽然最近几十年已经有了非常大的发展，但是相对城市来说还是比较落后的。更重要的一点是，在

大规模人口流动的背景下，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流出村庄，留在家里面主要就是老人，所以农村人口的养老问题更严重。

第一，从农村养老养老制度层面上来说，进一步完善医保、社保，从而完善农村相关的制度体系建设。

第二，从宏观政策上来说，乡村振兴战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契机或者一个抓手，吸引人才回到乡村，然后重新振兴乡村，一定程度上也会改善农村养老的困境。

第三，从大数据等新兴科技的发展来说，科技也能助力农村养老。比如在农村医疗体系建设方面，现在有了网络问诊、远程问诊，很多专家不一定要到村里去，只要有一个网络平台、有5G网络技术的支撑，远程问诊根本就不是问题。科技为农村养老提供了有益的支持，有助于农村医疗条件的改善、农村老年人健康水平的提高等，关键是如何操作、如何实现。

李书娟：养老一方面是生活保障比较重要，另一方面就是医疗，或许未来可以在农村医疗方面有所改进。农村一般离县城较远，而老人通常身体都有一些毛病，当出现紧急情况，比如突发心血管疾病，抢救时间是非常宝贵的，可能就会因为距离远无法及时救治。针对这个情况，设置服务站、紧急联络人等，我觉得是比较可行的方法。还有农村老人的体检，目前我们已经在很多地区开展了这项服务，每年下乡免费给60岁以上的老人体检一次，这是值得全面铺开的项目。

杨哲：我国农村老龄化率还在继续上升，并且上升速度比城市老龄化的上升速度快，这主要是城乡人口流动形成的。比如说与我们相邻的深圳市，老龄化率只有百分之五点几，远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并且还在继续下降。那相反地，在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流出的地方，老龄化率将迅速攀升，尤其是农村地区。由于过去农村土地要素流动性的限制，农村人口并不是由于擅长经营农业生产而选择去农村的，而是由于不擅长离开农村才留在农村的，这种逆向选择给农村老龄人口的服务造成了困难，即农村老年人口是消费水平相对较低的群体，因此市场开发价值低，市场化进程较难推进，并且由于青壮年人口大量流失，在农村难以找到足够的专业护理人

员，加上农村老年人居住较为分散等实际情况，发达地区以及城市的养老经验很难移植到农村来。

为了应对这种挑战，我建议因地制宜，突出重点。比如，农村养老最困难的群体是失能、半失能的高龄老人。失能包括生理上的失能，比如不能站立或者行动不便，还包括完成日常活动的失能，即不能办理某些事情，比如去银行取钱，或者打电话有困难等等，都属于失能。由于上述诸多困难，我们很难用市场手段解决这部分老人的养老服务问题，因此国家在给予制度和资金支持时，或许还可以设立公益岗位，动员低龄健康老人为高龄的失能、半失能老人，提供部分日常照料和看护服务。

您理想的未来农村养老是什么样的情景呢？

李书娟：我很喜欢农村，农村特别宁静，所以我理想中的是到农村去养老。有些城市居民会到农村买房，准备老了以后去那里居住，这其实也是很多人的理想养老状态。如果农村的生活水平、医疗保障都能够跟上去的话，我觉得去农村养老是很完美、很理想的状态。对我来说，我觉得在农村养老，可能比城市养老更好。

目前国家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且未来养老行业需求量巨大，如果有创业的朋友想投身农村养老服务行业，您有没有好的建议？

蔡澍：投资农村养老是有一定挑战的。首先是刚刚提到的观念的问题，因为大部分人存在对机构养老的歧视，但是机构养老的需求是比较大的，只不过是潜在的需求，所以首先要打破观念的限制。第二是改善服务质量，养老机构的软件、硬件都要跟得上。第三个是要接地气，这也很重要，办一个养老机构需要考虑的比如，老人们吃什么，得适合老人吃的，还得适合当地人吃的。我觉得最能回答这个问题，最有发言权的还是我爸。

在养老方面，政府的支持力度还是挺大的。为了解决养老问题，国家也召开了很多重要的会议，明确了未来的发展方向，对于家庭养老、机构养老、社区养老也有很清楚的定位。国家对机构养老是非常支持的，包括政策和资金上。如果有在农村办养老院的想法，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可以先从试点做起，比如回老家办一个养老院，做成规模之后再进行推广，最终做到连锁上市。

家庭经济学专题

【澎湃】冯帅章 韩昱洁：单身未必是“贵族”，“单身经济”热的冷思考



作者：冯帅章（暨南大学经济学院、经济与社会研究院、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韩昱洁（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乡村振兴研究院研究员）

城市越来越大，家却越来越小了。近40年来，中国家庭户平均规模持续下降，从1982年的4.41人，1990年的3.96人，2000年的3.44人，到2010年3.10人。2020年的七普数据显示，家户平均人口已经不足3人，达到了创纪录的2.62人。

“三口之家”的家庭形态正在消减，取而代之的一股新兴力量是独居一人户。根据人口普查数据和统计局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我国中国一人户占比逐年攀升，2000年为2.52%，2010年为6.68%，2015年为13.15%，2019年增加至18.45%。粗略估计，目前有近一亿成年人处于独居状态。“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实。

单身浪潮已成为不容小觑的一种社会趋势，并催生出了一系列新的经济形态、商业模式、社会现象。为了满足单身群体的消费需求，个性化、小众化和精致化消费产品层出不穷，“一人食”、“一人住”、“一人游”炙手可热，甚至出现“日租男（女）友”等定制化服务。然而，在中国，单身比例到底有多高？什么样的人单身？单身收入更高吗？单身消费有何不同？对单身者而言，独居生活“经济”吗？对于社会整体长远发展而言，“单身经济”又意味着什么？



单身人数变多已催生出新的消费观和新的消费业态

谁在单身？

从年龄来看，青年和高龄老人是单身的两大主力军。根据 2015 年人口抽样调查数据，适婚年龄的人群中，80 岁以上和 30 岁以下人群的单身比例最高，占比分别达六成和五成。然而，不同年龄段的人群单身的原因大不相同。在单身人群中，30 岁以下年轻人基本是未婚单身，30 岁到 39 岁中也有七成以上是未婚单身，40 岁到 49 岁中 45% 是离婚单身，而 50 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中大部分是丧偶式单身。

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初婚年龄推迟、离婚率增加，中青年的单身比例也大幅攀升。从 2000 年到 2015 年，最明显的两大变化：一是 30 岁到 39 岁单身群体中未婚的占比从 65% 逐年上升到 72%；二是 40 岁到 49 岁和 50 岁到 59 岁两个年龄段的单身人群中离婚的占比都越来越高，15 年来占比分别增长了 77% 和近 200%。

分性别来看，在“剩女”现象愈演愈烈的当下，真的是女性多单身吗？统计数据给出了相反的答案——年轻群体中，男性单身比例稍高于女性。值得关注的是，在广大农村，男性“打光棍”现象逐渐普遍化。除了农村出生婴儿中男性比例畸高的人口因素之外，高昂的彩礼、婚恋观念变化等社会原因也助推了这一现象。但随着年龄增长，社会上女性单身比例开始反超。50 岁以后的女性单身比例更高，尤其是 80 岁以上的女性有 75% 都是单身，而男性仅 42% 左右是单身。这也反映了男女预期寿命的差别。

再来看学历，在婚恋市场上，学历越高越难找对象，大数据也验证了“高不成低不就”的老话。按教育程度来看，单身比例最高的是研究生、本科生和未上过学的人群，分别是 42%、40% 和 38%。而教育程度处于中间段的小学、初中和普高是单身比例最低的三组人群。学历对于不同性别的单身状态影响也是不一样的。女性学历越高越倾向单身。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单身人群中，女性占比高达 6%-11%。与此同时，小学及未上过学的单身人群中女性比例也远远更高，这可能因为老年单身人群中女性较多，且她们学历普遍较低。相比之下，初高中学历的单身人群中，男性比例更高。

那么，未来单身人士数量和比例还会继续增加吗？历史数据演变已给出答案。根据 2000 到 2015 的四次普查，40 岁以下中青年的单身比例正在急剧攀升。从 2000 年到 2015 年，30 岁以下年轻人群中单身的比例从 36% 升到 50%，占比提升了近 40%；而 30-39 岁中青年人的单身比例则从 5% 上升到 11%，占比翻倍。按照目前趋势，未来总的青年人群中单身比例可能会继续上升，尤其是 30-39 岁的青年单身人群。晚婚已成为全球普遍现象，美国佩尤研究中心数据显示，男性和女性的初婚年龄在过去半个世纪中，都推迟了大约五年。

单身未必是“贵族”

“单身经济”一词最早源于经济学家麦卡锡 2001 年在《经济学人》上提出的“单身女子经济”现象，她们因独身而收入不菲，比其他阶层更有花钱的激情与冲动。之后，“单身经济”逐渐脱离女性概念，但这一群体的“贵族”标签仍留存了下来——单身人士往往“高学历、高收入、高消费”“享受生活、注重情趣”。在中国，单身群体真的都是“贵族”吗？我们从收入和消费两个角度的数据来看一看，单身与已婚群体有何不同。

1、单身者更拼，赚更多？

如今的都市剧里，单身成功人士的形象比比皆是——他们大多被打上了“工作狂”“高收入”的人设标签。埃里克·克里南伯格在《单身社会》一书中也提及，单身群体的共同点之一：他们将自己的“自由时间”都花在了工作上。那么现实生活中，单身人士真的比已婚人士更拼命，赚更多吗？

根据 2017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30 岁以下、30-39 岁、40-49 岁适婚年龄的单身群体平均月工资收入分别是 3567 元、4038 元、3226 元，比相应年龄段的已婚群体的平均月工资收入分别低了 7.3%、9.9%、18.2%。可以看到，这一收入差距随年龄增加而逐渐扩大。即使在相同特征（性别、受教育水平、年龄、户籍地和户口类型）的人群中，单身群体的平均收入仍低于已婚群体 13.7%。

对于男性而言，单身者的收入明显低于已婚者。20-49 岁的单身男性平均月工资 3786 元，低于已婚者的 4703 元。这和美国早期研究的发现类似，即使考虑到两类人群多方面人力资本水平的差异后也是一样。然而，有些人会有疑虑，人力资本水平无法被完全量化和控制，而上述研究的差距可能是由于优秀的人都结婚了，且他们的收入往往更高。为了消除这一疑虑，有研究通过比较家庭背景、成长经历相似的男性双胞胎，假定他们个人能力相同，仍然发现双胞胎内部已婚男士收入更高。收入增加的可能原因有两个：第一，结婚之后能让人专心工作，从而工作效率更高；第二，雇主更喜欢结过婚的员工。无论原因为何，平均而言，单身男性收入更低，而钻石王老五只是特例。

对于女性，情况有所不同。上世纪国外研究发现，已婚女性的收入通常比未婚女性更低，主要是因为家庭分工导致婚后女性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到家务活中。但随着女性地位提升、高科技解放家务劳动力，近几十年来，国外已婚女性与未婚女性的收入差距逐渐减小，甚至在没有孩子的情况下收入可能反超未婚女性。这与我国中国目前数据显示的情况基本一致。2017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显示，20-49 岁单身女性月收入平均为 3400 元，仅仅略低于已婚者的 3482 元。

2、单身者更爱悦己消费？

商家看好“单身经济”兴起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抓住了单身者更加需要“悦己”的心理诉求。大家普遍认为，除去生活必要支出外，单身人士比已婚人士更加注重提升个人生活品质和丰富业余生活。尼尔森发布的《中国单身经济报告》显示，对未来一年的消费计划中，单身青年购买食品饮料的可能性与非单身者差不多，而在买衣服、电子产品、护肤品等悦己消费的可能性上，单身者高出了 10% 左右。那实际消费情况究竟如何呢？

从消费的绝对量来看，单身群体的确花得多。根据 2017 年 CHFS 数据，非单人户户均消费 5.2 万元，人均年总消费 1.5 万元；而独居户年均总消费 2.8 万元。两

类家庭人均消费数额相差近一倍。即便刨除了未成年人消费，非单人户中的成年人人均年总消费也仅为 1.8 万元，远低于独居户。即使比较相同特征的家庭（户主年龄、性别、教育水平、户籍、户口类型以及家庭人均收入），非单人户的年人均消费仍低 35.6%。

不过，单身者花费更多并非为了悦己，而是在生活必需品上。数据显示，相比单人独居户，非单人户的人均医疗消费低 36.0%，饮食消费低 32.2%，水电、物业、暖气等居住费用低 24.9%，日用品消费低 16.0%。从消费占收入比值来看，非单人户主要在饮食、医疗和居住消费更低，分别低于单人独居户 12.2%、4.3% 和 3.4%。这也印证了一个观点——与伴侣共同居住可显著降低生活成本，单身并不是一个“经济”的选择。美团研究院《2019 年及 2020 年上半年中国外卖产业发展报告》发现，单身独居是外卖的主力消费人群，占比高达 44.6%，而近 67% 是因为“不想出去”而点外卖。

与普遍认知相反，实际更多花钱悦己的是非单人户。除了因养育子女导致的人均教育消费相较独居户高出 192.7% 之外，非单人户的人均交通、衣物、文化娱乐消费分别高出独居户 95.9%、63.6%、23.0%。

与此同时，非单人户的储蓄率显著高于独居户，大大提升了家庭抗风险能力。根据 2017 年 CHFS 数据，非单人户的人均消费占人均收入比为 77.8%；而独居户年均总消费占收入比为 97.4%，几乎月光。两类家庭人均消费收入占比相差接近 20%，单身贵族往往也是“月光族”。尼尔森 2020 年发布的《中国单身经济报告》显示，40% 的单身人群表示未购买过任何理财产品，远超非单身者的 22%。

“单身经济”背后的隐忧

当商家们都在欢呼“单身经济”、大开脑洞为其定制产品和服务之际，我们更应该认识到，“单身经济”不过是社会人口结构变化的自然产物。我们需要理性看待，客观应对。

从全球范围来看，经济社会发展、新生代教育水平逐渐提升，自然伴随着单身人口和比例逐步增长。《单身社会》一书中的数据显示，1950 年，仅有 22% 的美国成年人单身，如今这一比例已超过 50%。

在中国，单身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是男女性别比例失衡。七普数据显示当前人口性别比达到 105.07，而男多女少的情况在越低的年龄组越严重，2020 年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 25 岁以下人群的人口性别比甚至超过了 110。二是人口教育水平提高，尤其是平权社会下女性受教育程度的大幅提升。经济能力上，女性获得自主权后，婚姻不再是人生唯一出路。婚恋观念上，“灵魂伴侣”和“宁缺毋滥”的现代婚姻观念一方面导致推迟结婚，初婚年龄从 1990 年的 23 岁逐步上升到 2018 年的 26.5 岁；另一方面也导致了离婚率的增加，粗离婚率从 1987 年的 0.5‰ 攀升至 2020 年的 2.6‰。



“单身经济”正是对这一人口结构变化的适应性供给端调整。可以预期，单身率将继续走高，单身人群还会不断增长，单身经济方兴未艾。但是，为了发展眼下的新型消费业态，过度营销将“一个人”与“自由”等同起来，或是鼓励单身，则大可不必。

对商家而言，单身人口的持续增长带来的少子化、老龄化问题，必然导致整个社会的长期消费能力下降、经济发展放缓。从这个角度来看，当前一些人鼓吹的单身“万亿市场”狂欢不过是竭泽而渔。

对个人而言，独居在年轻时可能精彩，但到年老后却潜藏危机，重病以后无人护理、甚至孤独死去让一些单身独居者感到不安和恐惧。比我国中国老龄化程度更深的邻国日本，早就将独居问题，尤其是老年人独居问题列为了重大社会问题。

对整个社会而言，单身人口持续增长带来的长期挑战更是不容忽视。一方面，经济长期发展的动力来源于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单身人群的增多会加剧生育率下降，导致社会发展动力不足。另一方面，单身人口增长伴随着老龄化现象，会导致社会创新能力下降，经济活力不足。携程集团创始人梁建章在与合作者的一篇论文中发现，人口老龄化会显著降低一国创业行为的参与率与活力。当企业重要岗位更多被资历高的老龄员工占据时，年轻人难以积累经验，创业的可能性也大大降低。

其实，单身未尝不是部分人应对“婚恋内卷”“教育内卷”的一种“躺平”方式。在生育率超低、人力资源即将面临相对枯竭的当下，“结婚壁垒”和“生育壁垒”才是应该被关注和破除的重点。今年六一儿童节前一天落地的“三孩政策”是国家对于生育政策的重大调整。与其过度关注“单身经济”本身，不如将焦点转移到生育、教育、住房等民生领域，通过配套政策调整帮助人们更好地实现“婚姻自由”和“生育自由”。让单身不再是一种无奈的“躺平”，而仅仅是反映不同人群的选择偏好。

本文首发在澎湃新闻网

大型离婚现场：谁来呵护中国人的婚姻



作者：冯帅章（暨南大学经济学院、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唐高洁（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

结婚不易，维持一段婚姻更不易。2021 年 12 月 15 日，王力宏发布微博宣布离婚，引起舆论哗然。盘点今年以来，已有大 S 汪小菲、李湘王岳伦、佟丽娅陈思诚、赵丽颖冯绍峰等多对明星夫妻分道扬镳，其中婚姻维持最短的仅有 2 年。娱乐圈俨然成为大型离婚现场。

明星频繁曝出离婚，只是近年来中国全民离婚率不断攀升的一个缩影。民政部数据显示，2020 年，我国共有 433.9 万对夫妻离婚。这一数据从 1987 年的 58.1 万对一度增至 2019 年的最高峰 470.1 万对。

离婚，正逐渐从传统社会里避讳的负面行为，变成如今夫妻双方平等拥有的权利。尤其随着女性受教育水平提升，现代女性的经济权和个体思想趋于独立，不再向低质量婚姻妥协。在近期王力宏离婚事件中，前妻李靓蕾也发文省思女性作为全职家庭主妇全力付出却不被尊重的弱势现状。

舆论态度也在发生变化。2021 年 4 月，赵丽颖和冯绍峰官宣离婚。一改以往“再也不相信爱情”的负评如潮，这一回舆论却是一片“叫好”，粉丝在女方微博评论区直呼“姐姐好棒”。有舆情监测显示，该事件的网络传播正面情绪高达 83%，中立和负面情绪仅占 9% 和 8%。

离婚，真的是两个人的重获新生还是一地鸡毛？为什么近年来中国离婚率持续上升？一个家庭的解体，会对男女双方乃至子女各自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社会政策能够怎样促进缔结并维持健康的婚姻？

离婚低龄化现象：从“三十而立”到“三十而离”

2020 年，第一批 90 后迈入而立之年。古人成家立业的年纪，在现代社会却是“三十不婚”，乃至“三十而离”。郑州市民政局统计显示，90 后离婚人数已占全市总离婚人数的两成以上。2019 年湖北省十堰市离婚夫妻中，35 岁以下的占比达 45%。

离婚群体年轻化趋势显著。高颖,张秀兰和祝维龙(2012)根据北京市婚姻登记数据研究发现,从人群来看,离婚者的年龄主要集中在 30-45 岁之间,占总体离婚人群比例超过 60%。从趋势来看,30 岁以下的年轻人和 50 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的离婚比重上升相对更快。

对于年轻世代,不合适的婚姻要快速结束,婚姻寿命显著下降。於嘉,赵晓航和谢宇(2020)的研究数据显示,2000-2004 年间结婚的夫妻,婚后十年内离婚比例仅为 3.7%。如今,结婚一年即离婚的比例正在反超。2020 年江苏省办理的离婚登记中,结婚一年以内就离婚的有 2.3 万对,而 2019 年江苏省结婚登记数仅为 56.9 万。这意味着,2019 年江苏省结婚的夫妻中,约有 4% 的夫妻在结婚一年后即离婚。

伴随 90 后加入“离婚大军”,中国近年来每年离婚登记人口处于上升态势。2009 年,办理离婚手续的夫妻有 246.8 万对,这一数字 2019 年上升到了 470.1 万对。2020 年离婚对数出现了近年来的首次下降,为 433.9 万对,其中主要因素是结婚人数的快速减少。数据显示,中国结婚登记对数自 2013 年的近年峰值 1346.9 万对,已持续下跌至 2020 年的 814.3 万对,创 2003 年以来新低。

从离婚群体的人口占比来看。根据国家统计局 2014 年的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以及 2014 年以来离婚登记人数加总估算,截至 2020 年,有过离婚经历的在中国约有 8000 万人,占 15 岁以上人口约 7%。

从地域来看,粗离婚率,也就是平均每千人口中的离婚对数,呈西高东低、北高南低、人口流出地高的趋势,东北地区及中西部人口流出较为严重的省区粗离婚率最高。2020 年,粗离婚率最高的黑龙江、天津和吉林,粗离婚率达到 4.5‰。广东、甘肃、西藏粗离婚率最低,分别为 1.9‰、1.7‰和 1.2‰。当然,这并不一定代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平均离婚偏好更高。有可能因为经济欠发达地区本身的已婚人群占比高、基数大,自然离婚对数会更多,使得千人中的离婚对数自然偏高一些。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平时我们在媒体中看到的动辄超过 30% 的“离婚率”其实是“离结比”,即由当年离婚人数除以当年结婚人数计算而来。很明显,同一年内结婚和离婚是两个不同人群的选择,并不代表平均每千对夫妻中有多少对选择离婚。因此这一计算方法得到的“离结比”不具特别意义。由于结婚率降低,离结比上升更快,很容易制造恐慌并误导大众。

相对而言,“粗离婚率”即平均每千人口中的离婚对数,相对更具参考性。但由于分母人口中包含了老年人、青少年等非适婚群体,因此也无法精准描摹适婚群体的离婚现状。离婚,确实是一个不断增长的社会现象。其实,离婚率上升已成为全球化现象。自二战以来,许多发达国家的离婚率都急剧增加。

城市化进程中的家庭解体：离婚成本大幅下降

离婚率的上升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文化价值观。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当离婚的好处超过离婚的成本时,个人会选择离婚。离婚成本既包括直接成本,即离婚经历的手续、花费的金钱和精力、离婚者所受的歧视和污名等;也包括机会成本,即所放弃的婚姻的效用。

当传统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转变时,离婚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往往都会下降,离婚的可能性因此上升。首先,传统社会由家庭所承担的各种重要的社会功能逐渐由市场和社会承担,个人从婚姻中可获得的经济利益下降,降低了离婚的机会成本。其次,结合社会学角度来看,整个社会对离婚的包容性逐渐增强,法律对离婚行为更为宽松,社会性代价和心理负担下降。物质需求在婚姻中的不可替代性下降,也意味着感情价值在婚姻的比例提升。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司法大数据专题报告》(以下简称《专题报告》)统计了 2016-2017 两年间的民审一审审结案件显示,77.5% 的夫妻是因感情不和而申请离婚,家庭暴力原因占 14.9%。

此外,现代化过程中往往伴随着人口流动性增强,人们的接触面更广,更有可能做出重新选择的行为。刘彬彬,崔菲菲和史清华(2018)的实证研究发现,在城镇化进程中,随着村庄流动劳动力占比的增加,农村离婚率显著上升。在流动劳动力中,劳动力流出是导致村庄离婚率上升的主要因素,而劳动力流入对村庄离婚率没有显著影响。其原因可能是,农村劳动力的流出方向主要是城市,而流入农村的劳动力基本上也是村民。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他们接触到与农村截然不同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巨大的环境变化容易改变流动者的价值观,打破婚姻匹配均衡,导致离婚率上升。相反,劳动力流入村庄对村庄离婚率没有显著影响。相比于流出到村外县内的劳动力而言,流出到县外省内的劳动力比例越高,村庄离婚率越低,流出到省外对村庄离婚率没有显著影响。这说明流动距离在村外县内时,流动的劳动力与当地居民在文化、习俗和语言上差异相对较少,互动交流较多,这样的流动会降低搜寻新配偶的成本,提高离婚风险。随着流动距离增加,文化差距也随之拉大,村庄离婚率反而会降低。

女性个体意识觉醒：逃离低质量婚姻

女性在婚姻中的地位、角色、观念变化,也正在改变家庭关系现状。随着女性经济地位的提升和女性受教育程度大幅度提高,女性个体主义价值观形成,更多女性意识到要在婚姻中提出合理的诉求、捍卫应得的权利、行使平等的选择权。从价值观到经济分配上,都要求实现平等尊重家庭中不同的角色分工。王力宏前妻李靓蕾在离婚后即提出了重视全职主妇对家庭付出这一议题,“家庭中被分配到这个角色(全职主妇)的成员,不应该是理所应当永远没有经济能力或积蓄,而担任在外工作的那一方获得所有的利益和权利。这样会形成不对等的关系,也会让女性处于弱势,即便男生出轨或家暴也难以有话语权。”

如果无法获得高质量的、平等受尊重的婚姻,女性会更主动选择终止。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目前大部

分的诉讼离婚是女性主动提出。根据《专题报告》,在诉讼离婚中,有 91% 的离婚案件为夫妻双方只有一方想离婚,另外一方不同意离婚。在 2017 年的 140 余万件离婚诉讼案件中,73.4% 的原告为女性。

一方面,这显示出女性在婚姻中获得的满足感更低。有可能是女性过去在家庭中承担了更多抚养子女、操持家务等责任,甚至全职主内;而男性则倾向于少承担家庭义务,或者完全主外而忽略了对家庭其他义务的承担。另一方面,也可能体现了现代女性对于婚姻质量的要求和期待更高,对于低质量感情的容忍度更低,一旦出现挑战婚姻忠诚度的事件,女性不再是妥协忍让的一方。同时,男女经济地位的平等,也使得女性更有底气主动解除婚姻。

重启婚姻：男女再婚的性别优势存在城乡差异

离婚既是一段婚姻的终点,也可以是下一段婚姻的起点。

虽然离婚人数和粗离婚率连年攀升,但处于离婚状态的人群占比在近二十年内上升程度较低,这主要是由于中国离婚人群的再婚率较高。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0 年,中国处于离婚状态的人群占 15 岁以上人口比例为 0.9%,而 2019 年,这一比例也仅为 2.3%。在总结结婚登记人数连年下降的情况下,再婚登记数和所占比例连年上升。2001 年当年登记结婚人口中,再婚者所占比例仅为 7%,2019 年这一比例达到 25%。也就是说,对于选择离婚的人群来说,对婚姻的需求并未变化,变化的只是人们对待婚姻冲突的态度。

男性和女性对于再婚选择差异较大,城乡差异明显。使用 2014 年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抽样数据分析发现,在离婚人群中,男性和女性再婚的比例分别为 49.5% 和 59.3%,女性再婚率比男性约高出 10 个百分点。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农村女性再婚率较高。一方面,农村男女比

长期处于失衡状态，农村女性在婚姻匹配过程中具有更多选择空间。另一方面，过去农村女性经济和社会地位较低，甚至需落户在夫家，一个人较难生活。舆论和经济压力迫使她们尽快再婚。对于城市化率较高的发达地区，情况则截然相反。男性总体的再婚率则远高于女性。高颖和张秀兰(2012)发现，北京男性的再婚概率约为女性的 2.4 倍左右，且在时序上基本保持稳定。

从离婚男女各自的选择面来看，城市女性处于相对不利地位。虽然初婚者和再婚者均是潜在的婚配对象，但从北京市的数据看，婚姻市场对于初婚和再婚的匹配仍然存在一定的分割。再婚男性约有 60% 与离婚女性结婚，再婚女性则有 67% 是与离婚男性结婚。而离婚女性与初婚男性的婚配比例仅为 26%，低于离婚男性与初婚女性的婚配比例 37% 约 10 个百分点。这表明离婚经历对于女性再婚的负面影响，可能大于对男性的影响。

从年龄差来看，离婚后再婚的夫妻平均年龄差比初婚平均年龄差更大。其中，离婚男性再婚的夫妻年龄差为 5.4 岁，女性为 3.2 岁。与此相比，初婚夫妇的平均年龄差为 1.8 岁。也就是说，男性再婚可以选择的女性年龄段范围更大一些。

从教育程度来看，教育对于男性和女性离婚后再婚的影响是相反的。对于离异男性来说，学历高者更容易再婚。女性反之，教育程度低的女性在失去配偶后倾向于再婚，而教育程度高的女性由于就业和收入相对稳定，倾向于保持独身状态。男性离婚后再婚者中有 65% 以上的人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比离婚后独身者的相应比例高出 25%。女性离婚后再婚者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者的比例仅 36%，而离婚后保持独身的女性中，66% 均为大专及以上学历。

离婚创伤：酸甜苦辣，各自滋味在心头

一个家庭的解体，必然会对分离的个体带来伤害。对于选择诉讼离婚的家庭，更是需要经历漫长的折磨期。在深圳，所有准许离婚的案件中，第一次起诉与第二次

起诉、第三次起诉分别占比为 14%、85%、1%，大部分诉讼离婚成功的人都需要经历二次诉讼，历时超过一年。此外，当案件的复杂程度和调查取证难度较大时，案件审理经历多次开庭、时间长达两三年甚至以上也司空见惯。

离婚后将进入另一段感情低谷期。Leopold 和 Kalmijn (2016) 对德国的长期跟踪数据研究发现，离婚后夫妻幸福感都会有较大下降。已育家庭离婚后的幸福感下降更为严重，尤其对于孩子仍处于幼儿期的夫妻，幸福感下降得更多。但是，不论有无子女，离婚人士幸福感的下降都没有长期持续，在离婚后 1 年时达到低谷，此后开始上升，在离婚第五年后达到离婚前的水平。

由于婚姻对男性和女性生活的影响模式不同，因此离婚对于男性和女性的影响也并不相同。婚姻对男性的好处主要来自于配偶的社会支持和连接，以及更健康的生活行为；而女性则主要是从婚姻中获得经济支持。与之相应地，离婚后女性经济状况相对于男性下降更多，男性的幸福感和健康则下降更大。Shor 等人 (2012) 通过以大数据文本分析的方式分析了 1995～2011 期间关于婚姻破裂和死亡的研究，发现离婚和分居者的死亡风险比已婚人士高出 30%，且对男性的影响更大，男性死亡风险增加 37%，女性则增加 22%。此外，婚姻破裂对于个体的伤害程度也与个体所在的社会环境、文化习俗等密切相关。面对离婚，男性更有可能表现出外化行为如酗酒，而女性更经常经历内化问题如抑郁。

虽然离婚本身伤害了人们的心理和身体健康，但长期处于感情破裂家庭，比平静的单身生活更为不利，这对于女性的影响尤为显著。大量研究表明，与积极互动相比，冲突和相关的消极行为更能预测人际关系困扰和健康，不幸的婚姻同样有害健康。与支持型配偶关系相比，消极的配偶关系与抑郁症的关联几乎翻了一番。而且，在不满意的婚姻关系里，女性会表现出更低的身体和心理水平。实验室研究也表明，在讨论与婚姻有关的冲突话题时，女性经历更多的生理痛苦，如内分泌和心血管反应。

父母离婚如何影响到子女的问题，始终备受关注。传统观念认为，双亲抚养最有利于孩子的健康发展。但研究表明，真正影响孩子发展的主要原因可能是离婚前的家庭冲突，离婚导致双亲对孩子金钱和时间上的投资减少，以及再婚后新家庭组建产生的部分负面影响。因此离婚诉讼案件中，子女抚养权的判决尤为关键。离婚后子女能否受到父母双方中更注重子女成长的一方监护，以及离婚后的抚养中双方能否同心协力、不因个人情绪对孩子造成额外伤害，对孩子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

30天冷静期：都是冲动惹的祸？



国家也试图出台更多政策挽救婚姻。2021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的《民法典》中，增加了冷静期“制度”，强制在夫妻正式登记离婚前加上 30 天冷静期。这一举措引发热议，有人觉得这能有效避免“冲动离婚”，成为维持婚姻的“最后一根稻草”。也有人认为这损害了“离婚自由”，成为夫妻中更想离婚一方的“绊脚石”。

我国实行双轨制的协议离婚制度，分别是协议离婚和诉讼离婚。由于协议离婚的手续简单、结果明确，大多数人选择了协议离婚。以 2019 年为例，全年办理离婚登记一共 470.1 万对，其中通过民政部门登记离婚为 404.7 万对，比例高达 86%；通过法院判决、调解离婚约为 65.3 万件。如果算上当年法院审理离婚一审案件 137.8 万件，把一审案件的夫妻与民政部门登记离婚夫妻划定为当年提出离婚的夫妻，那么，在 2019 年提出离婚的夫妻中，仍有 75% 选择了协议离婚。

新实施的“离婚冷静期”，相当于增加了协议离婚的程序，也使得结果变数更大。2021 年起，协议离婚需要经过申请、受理、冷静期、审查、登记（发证）。如果在冷静期内其中一方反悔或对离婚协议不满意，便需要重新谈判，离婚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

从数据来看，新政效应立竿见影，协议离婚登记对数显著下降。武汉市民政局数据显示，2021 年 1 月，武汉市共受理离婚申请 3096 对，截至 3 月 5 日，经过“30 天冷静期和 30 天办理期”，首批办理离婚登记 1309 对 / 月，约 58% 的夫妻申请后放弃登记。广东省民政厅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 12 月，全年离婚登记对数仅达到 2020 年全年登记对数的六成左右。但需要注意的是，申请离婚登记对数并未发生太大变化，同期申请对数较 2020 年全年登记对数基本持平。

与此同时，各地法院离婚案件出现大幅增长。资阳市安岳县人民法院公布《安岳法院反映离婚冷静期制度实施以来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称，为规避冷静期，更多夫妻选择直接进入诉讼离婚。2021 年 1-11 月，安岳法院共受理离婚案件 1163 件，已高于前三年全年平均受案数 1033.67 件。同样地，2021 年上半年，广东省茂名市法院新收离婚纠纷案件 2705 件，同比增长 24.31%。

由此可见，冷静期降低了协议离婚的“成功率”，但很难真正挽救婚姻。毕竟“一时冲动”并非离婚主因，更多夫妻还是因为性格差异、感情破裂、家庭不和等问题无法解决调和，而分道扬镳。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 2021 年发布的《秦淮法院家事审判白皮书（2016-2020）》显示，婚前缺乏了解，草率结婚，婚后发现生活习惯、性格不合，产生矛盾，占比 34.21%；婚后缺乏沟通和理解，对问题的处理无法心平气和交流，感情逐渐出现裂痕，占比 30.16%；涉及一方出轨，背叛家庭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占比 16.7%；婆媳关系不睦或子女教育理念差异等导致夫妻离婚的，占比约 16.83%。

从离婚原因的分布显示出，大部分诉讼离婚的夫妻在婚前对自己、对配偶和对婚姻的了解都不足，尚未真

正做好建立新家庭的准备就草率迈入婚姻。因此，婚前教育和离婚前的家庭辅导至关重要。有数据显示，加强离婚前的家庭辅导工作，通过第三方介入，能有效调解部分家庭不和、感情破裂的问题。

婚姻需要全方位的呵护

与其筑起离婚的障碍、保护不幸的婚姻，不如营造更有利于婚姻持续的社会环境。虽然女性的经济地位相对上升和个体意识觉醒可能是离婚率上升的重要原因，但是不可因噎废食。政策的总体目标不应该是阻碍离婚行为本身，让当事人停留在低质量的婚姻中，而是要建立高质量的婚姻。因此，从家庭关注的税收、住房、子女抚养等多方面予以政策支持，才能让婚姻在适宜的社会土壤里更好地发芽成长。

一是在住房政策上，推行有利于家庭的购房及住房制度。不仅要堵上政策漏洞，防止为获取购房资格而“假离婚”，更应该针对家庭实行按揭贷款利息等优惠政策。在中国台湾省，为鼓励青年成家，实行家庭购房前两年零利率购置住宅贷款利息补贴及租金补贴，每户每月最高 40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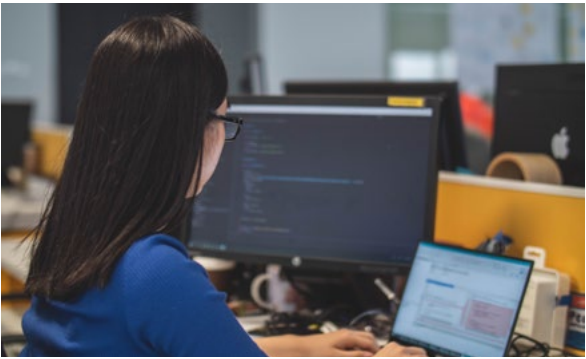
二是通过税收政策来创造“婚姻红利”，为建立新家庭营造良好的经济环境。目前，夫妻能享受到的税收优惠仅有子女教育的专项扣除，可以增加未育家庭的税收优惠，考虑婚后以家庭为单位纳税，给予较单身时更优惠的家庭收入税率，以支持新建家庭的开支。另一方面，目前税收制度存在一定“婚姻惩罚”。以住房贷款的专项附加扣除为例，单身时购房的每月纳税抵扣额度为 1000 元，婚后夫妻双方若名下各有住房贷款，以家庭为单位的抵扣总额仍为 1000 元，相当于比婚前可得的抵扣额度少了一半。可以调整专项扣除政策，至少恢复到婚前单身水平。

三是增加家庭成员相处时间、营造愉快和谐的家庭氛围。当前社会部分行业普遍流行的 996 工作制，使得夫妻双方都缺少共同相处和沟通时间，逐渐形成了以工作为中心的家庭生活习惯，忽略了对家庭的付出和对伴侣的体谅。目前各地密集延长生育假、育儿假的时间，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政策措施。这些举措在提升个人幸福感的同时，也有利于营造更和谐的家庭氛围，潜移默化中提升了生活质量和婚姻质量。企业也应相应行动起来，转变员工管理观念，制定更具人文关怀的工作及休假制度。

四是更多体现对于儿童权益的保障。婚姻解体对于儿童可能有长期的不利影响。建议遵循“子女最佳利益原则”，有专门的司法福利员和社会工作者确保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同时建立离婚案件父母教育制度，保证离婚父母清楚认识离婚对子女的影响，在满足子女未来发展需要的基础上尽量达成子女抚养协议。

本文首发在澎湃新闻

谷佳家：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女性真的工作更少吗？



作者：谷佳家（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

通常我们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会上升。但近些年，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和印度，女性劳动参与率都在下降。这似乎与我们看到的二战以后的发达国家的现象相反。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下降，能否说明女性工作得更少呢？

首先要指出的是，劳动参与率统计的是在工作市场上的参与，并不包括无酬劳动。从中国 2008 年和 2017 年的时间利用调查数据来看，算上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的总和，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城市，女性的工作时间都比男性长。无酬劳动最主要包括做家务和照顾家人。以 2017 年为例，城镇家庭里，女性每天平均花 3.64 小时从事无酬劳动，而男性只有 1.28 小时。农村家庭的差距更大。即便是在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的同时，在家庭内部，女性的工作时长依旧长于男性。

		2008 年		2017 年	
		男	女	男	女
城镇家庭	有酬劳动	5.45	4.06	7.24	4.95
	无酬劳动	1.91	4.24	1.28	3.64
	总劳动	7.36	8.29	8.52	8.59
农村家庭	有酬劳动	8.05	5.84	7.45	5.49
	无酬劳动	1.12	4.01	0.91	3.73
	总劳动	9.17	9.84	8.36	9.22

摘自《时间都去哪儿了，中国时间利用调查研究报告》表 5-3：中国城镇和农村家庭内部时间利用。单位：小时 / 天。

另外，如果从全世界各国的横截面数据来看，在同一时间点，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与人均 GDP 呈 U 型关系 (Goldin (1995))：在人均 GDP 较低的时候，女性参工率随人均 GDP 的增加而下降；在人均 GDP 较高时，女性参工率随人均 GDP 的增加而上升。有学者利用发达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研究 (Ngai, Olivetti and Petrongolo (2021))，同样发现，现今的发达国家也曾出现 U 型的女性劳动参与率曲线，并认为这与社会的结构转型有关：在经济早期，大规模农场的生产力比家庭农场提高更快，家庭农场退出市场的同时，男性更容易进入工业，而女性更多地选择了家庭生产（无酬劳动）；而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服务业兴起，女性更多地进入了服务业，女性劳动参工率也随之上升。从这个角度看，或许不难理解为何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女性的劳动参工率仍处于下降的阶段。

当然，U 型劳动参工率的存在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放任女性劳动参工率的下降。无酬劳动通常得不到社会 and 法律的足够认可，并且掩盖了女性原本可以通过有酬劳动为社会做出的更多的贡献。今年 2 月以来，北京房山、山东芝罘、浙江台州等地都有“全职太太离婚获家务补偿”的案件，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同样被公众热议的还有“女性职工休产假”问题：在缺乏政府补贴的情况下，延长女性产假的成本被转嫁到企业，只会进一步挤压女性的职场空间；更合理的政策应该是男女同休产假，鼓励男性参与家庭无酬劳动，建立日托中心，以及推动家务劳动市场化。从家庭角度来说，育儿与无酬劳动从来不应该只是女性的责任；从社会的角度来说，如果生育是利于国家，利于社会的，那么成本则更不应该只由女性承担。我们可以看到，在数据以外，越来越多的人正为保障女性劳动权益、争取男女平等付出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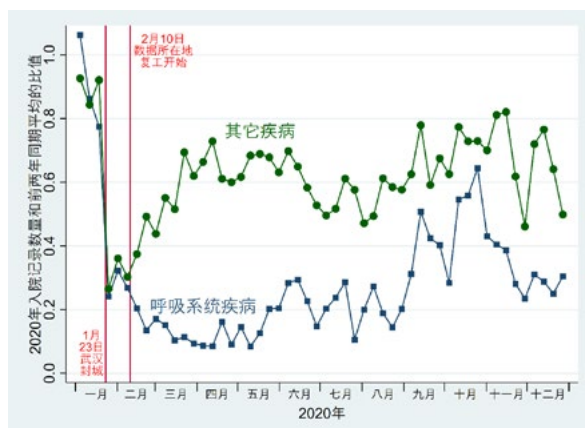
好文回顾

杨哲：防疫措施大幅减少其它呼吸系统疾病

作者：杨哲（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

自去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我国采取了包括“封城”、强制隔离、小区封闭管理、限制家庭户外活动、强制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和手部卫生等防疫措施，有效遏制了病毒的传播。研究显示，这些措施极大降低了新冠病毒传播速度 [1]。在阻断新冠肺炎病毒的传播途径的同时，疫情防控措施也有利于阻断大部分其它急性呼吸道疾病的主要传播途径，降低这些疾病的发病率。2020 年全国法定传染病报告发病死亡统计表显示，呼吸道传染病在 2020 年的发病率比 2019 年反而下降了 12.9% [2]。国外的研究也发现与新冠病毒无关的呼吸系统疾病和流行性感冒在 2020 年的患病率比以往显著减少 [3][4]。

为了确认患病率的降低是由实际患病数量的下降，而非由于疫情期间不方便或者不敢看病所导致，笔者的研究采用 2018-2020 年间北方某省会城市一家大规模综合性医院的所有儿科住院记录，整理后发现呼吸系统疾病和其它疾病的办理入院手续的数量相对变化在 2020 年全年呈现出下图中的趋势：



图中纵轴代表 2020 年每一周办理入院记录数量和前两年同期平均值的比值。横轴代表从 2020 年 1 月 1 日算起的每个七天（跳过 2 月 29 日）。数据点位于各个七

天时段中点。两道红色竖线分别代表武汉“封城”的 1 月 23 日和数据所在省份复工复产开始的 2 月 10 日（精确坐标位于当天正午）。统计的人数只包括当天办理入院的并且年龄从 28 天到 13 岁的患者（从 14 岁起，大部分患者不在儿科就诊）。新冠肺炎患者不在儿科收治，因此不在样本中。

上图显示，呼吸系统疾病和其它疾病的入院数量和前两年相比，都随疫情爆发而大幅下降，并且在疫情爆发前后短时间内变化轨迹一致。过了元宵节之后，二者分道扬镳：其它疾病相对前两年的入院人数比值快速回升，而呼吸系统疾病与前两年同期的比值继续下降。二者差距在四五月份达到最大，之后虽然有所缩小，但仍然维持。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 1 月 23 日到 2 月 10 日这段疫情防控形势最严重的时候，在同样存在不方便看病、担心院内感染的情形下，各类疾病相对往年办理住院的数量的下降幅度十分相近。如果呼吸系统疾病患者比其它疾病患者更不愿去医院，或者医院相应科室病床数量更紧张，这种差别应该在疫情刚爆发，防疫形势最严峻的几周里反应最明显，而不是等到复工复产之后才出现。之所以出现图中的这种现象，更合理的解释是针对新冠的防控措施对预防其它急性呼吸系统疾病的效果在数周之后才开始在入院人数中体现。

作为稳健性检验，笔者尝试把患者年龄下限由 28 天分别替换为 0 天、7 天、1 年，以及把呼吸系统疾病的范围缩小到只包括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流行性感冒和肺炎、其它急性下呼吸道感染，再以同样的方法作图，均得到非常接近的结果。

结论：防疫措施大幅降低了儿童其它呼吸系统疾病的患病率。

马森：我和我的室友：“同群效应”的估计和应用

作者：马森（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

在我们求学和工作的过程之中都曾经遇到过形形色色的室友。室友之间深厚的友谊让我们难以忘怀，室友之间不可避免的矛盾又曾经令我们不胜烦恼。能够与萍水相逢的陌生人共度一段人生的重要时光是一种缘分，也使得我们互相在各自的人生道路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室友之间的相互影响自然也成为了社会科学研究之中的一个重要的话题。在经济学的研究之中将这种相互影响视为“同群效应”（peer effect）的一种表现。“同群效应”即是指具有相同特征的个体之间的相互影响。室友之间具有相同的生活环境，生活轨迹，因此可以作为“同群效应”的分析对象。近年来学者们运用科学方法对于室友之间的“同群效应”进行了一系列的估计，在得到具有一定初步共识性结论的同时，也引出了更多有待深入挖掘的问题。

“研究方法”：如何估计室友之间的“同群效应”

科学地估计室友之间“同群效应”的一个重要挑战来自于对于因果关系的识别。如果人们可以自主选择和谁住在一起的话，那么具有相同特征的主体会成为室友，于是室友之间的相似性并不一定是室友之间产生了相互作用的结果。例如，学习成绩好的学生可能会更倾向于和其他学习成绩好的同学成为室友，于是我们便可以在统计数据之中观测到当一个学生的室友学习成绩更高时，该学生的学习成绩也就更高。然而这种相关性并不能够意味着学习成绩好的室友对于该学生的学习成绩起到了正面的影响。

因此，在对于室友之间的“同群效应”进行估计时，学者通常都会选择被试主体无法自由选择，且宿舍分配具有一定随机性的案例来进行定量分析。例如，一些大

学分配宿舍采用的是按照姓名字母顺序进行分配，由于姓名字母顺序和我们关注的结果，如学习成绩等变量无关，因此可以视为分配过程具有一定的随机性。另外一些大学分配宿舍本身就采取了抽签的方式，因此也可以被视为随机分配。甚至在有一些研究中，有条件的学者会参与到宿舍分配方案的设计之中，从科学的角度出发，直接设计随机分配方案。

在确保了宿舍分配具有一定随机性之后，学者通常会对于被试主体进行一段时间的追踪观察，通过研究被随机分配到不同室友特征的被试主体自身特征的变化，估计出室友特征对于个人特征影响的因果关系。例如，我们可以比较两个入学成绩相似的学生，其中一名学生被随机分配到了一个室友平均学习成绩较高的宿舍，而另一名被随机分配到了一个室友平均学习成绩较低的宿舍。我们观察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两名学生学习成绩的变化情况。如果发现被分配到室友平均学习成绩较高宿舍的学生学习成绩提升相对较快，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室友的学习成绩对于该学生的学习成绩产生了正向的“同群效应”。



学业表现在室友之间的“同群效应”

对于室友之间“同群效应”的研究首先集中在学业表现的方面。中外的一系列学术研究都发现了存在“同群效应”的证据。例如，在美国 Williams College 随机

分配宿舍的追踪研究（Zimmerman, 2003）之中发现对于一个 SAT 成绩（高中升入大学升学考试成绩）中等的学生来说，如果他的室友的 SAT 成绩较差（最低 15%），那么该学生进入大学之后的学习成绩（用 GPA 衡量）也会相对较差。在中国某大学随机分配宿舍的研究之中（Fang and Wan, 2020）也同样发现当室友的学习成绩更高时，被研究对象学生的学习成绩提升也更加明显。

后续的进一步研究发现，室友之间的“同群效应”在不同的学科有着不同的影响。意大利的一项研究（Brunello et al. 2010）发现室友之间的“同群效应”对于“硬科学”学科比人文和社会学科有着更明显的作用。作者们认为其原因在于“硬科学”学科的劳动力市场回报率较高，因此学生有更明显的经济激励利用“同群效应”提高自身的学习成绩。

另外有一些研究（Sacerdote, 2011）指出“同群效应”对于处于成绩分布不同区间的学生有着不同的影响。相对于处于分布中段的学生来说，处于分布两端的学生（最高和最低的 15%）受到“同群效应”的影响更加明显。

最后，“同群效应”的相关研究还从各个角度出发考察了室友之间“同群效应”的具体作用机制。首先，室友之间共同学习，互相帮助以及互相交流学习方法和经验明显是实现“同群效应”的首要途径。其次，某些室友不好的生活和学习习惯可能会扰乱其他同学的学习。再次，同宿舍室友之间可能形成某种竞争关系，因而提供了更多努力学习的激励。最后，平均表现良好的宿舍可能从教师或者学校获得更多资源的倾斜，因而对于所有室友都有正面的促进作用。

生活习惯在室友之间的“同群效应”

除了学业表现之外，学者们还对于在生活习惯方面是否存在室友之间的“同群效应”进行了讨论和研究，例如健康行为，以及吸烟饮酒等其它风险较高的行为。研究发现，在这些生活习惯相关的行为之中存在着比学业表现更加明显的室友之间的“同群效应”。

年轻人的不良生活习惯之间通常存在着很明显的互

相影响，美国的一项研究（Eisenberg et al. 2014）以大学随机分配宿舍为研究对象，分别研究了室友之间在各种不良生活习惯上是否存在“同群效应”。其研究的生活习惯包括有酗酒，吸烟，吸毒，赌博以及不正当性行为。该研究在酗酒以及男性的吸烟行为上发现了明显的“同群效应”。当随机分配到的室友更多地酗酒时，被研究对象会更多的饮酒，并且其学业表现也会受到负面的影响。然而在其他不良生活习惯上，该研究没有发现明显的“同群效应”。

除了不良生活习惯以外，另一些研究着重于分析健康指标本身是否存在同群效应。比如体重超标的室友对于其他室友的体重会有怎样的影响。印度的一项研究（Frijters, 2019）指出体重超标的室友不一定会导致其他室友体重增加，反而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同寝室友的体重。研究人员认为体重超标的室友能够改善整体寝室的睡眠情况，因而可能造成了对于健康程度正向的“同群效应”。

今后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不管是学业成就还是生活习惯，“同群效应”的研究对于教育领域的政策制定都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目前用科学方法进行“同群效应”估计的研究方兴未艾，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发展。

第一，更准确地估计影响的大小。对于教育政策制定者来说，只有更准确地估计“同群效应”的大小，才能够将该效应和其他政策效应相比较，进而找出最优的教育政策。

第二，需要更长期地追踪估计长期效果。目前利用随机分配宿舍进行“同群效用”估计的科学研究仍然以学校为主，观测期局限于学生在校时期，难以追踪更长期的影响。例如通过室友关系形成的人脉对于劳动力市场的表现以及今后职业发展等因素的影响。

第三，需要关注更多可能受到“同群效应”影响的因素。在能力方面，目前的研究着重于学业成就的研究。然而“同群效应”对于性格，价值观，社会资本等非认知方面的能力也能够产生影响，这或许可以成为今后研究关注的重点。

杨尚铭：房价上涨的逻辑及其未来趋势的判断



作者：杨尚铭（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

扁鹊见蔡桓公，立有间。扁鹊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恐深。”桓侯曰：“寡人无疾。”扁鹊出，桓侯曰：“医之好治不病以为功。”居十日，扁鹊复见，曰：“君之病在肌肤，不治将益深。”桓侯不应。扁鹊出，桓侯又不悦。居十日，扁鹊复见，曰：“君之病在肠胃，不治将益深。”桓侯又不悦。扁鹊出，桓侯又不悦。居十日，扁鹊望桓侯而还走。桓侯故使人问之，扁鹊曰：“疾在腠理，汤熨之所及也；在肌肤，针石之所及也；在肠胃，火齐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属，无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无请也。”居五日，桓侯体痛，使人索扁鹊，已逃秦矣。桓侯遂死。

——《韩非子》

近些年来，房价持续不断的上升扯动着人们的神经。市场参与者及政策制定者严密关注房价并试图预测其未来的走势。对于中国经济而言，房地产对中国过去十几年的城市化进程及经济发展贡献很大。然而，时下的高房价似乎已成为中国经济难以治疗的痼疾，至少在以下方面损害着中国的长期增长：

（1）房地产业的高速发展，吸引了大量的资金和人力，对制造业部门形成了挤压，而房价的持续上升则推高了制造业人力资本成本，进一步挤压了制造业的利润空间，扭曲了中国经济整体的资源配置效率。中美贸易战的到来，卡住了中国制造业技术升级的道路，技术升级必然需要人才及资本的投入，而房地产某种程度上已成为产业升级的阻碍。

（2）加大了经济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房价持续上升，引发了对房价存在泡沫及泡沫一旦破裂对金融系统及经济体冲击的担忧。

（3）加剧了贫富分化，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间以及城市内部有房与无房者之间的财富及收入差距迅速扩大。由于低收入者较高的边际消费倾向，财富及收入差距的扩大压低了经济体的总消费，在传统粗放投资的资本边际回报率持续降低的条件下，高储蓄引致的投资并不能对经济增长贡献太多。而且在高房价的预期下，投资可能进一步流入房地产相关领域，进一步恶化了结构问题。

（4）城市高企的房价大幅提高了城市生活成本，降低了年轻人的结婚与生育欲望，持续的低结婚率及生育率将使我国未来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愈发严峻。

（5）中华民族历来勤劳节俭，而房价快速增长助长了普通人快速上车快速致富的预期，助长了投机之风气，在普通人努力奋斗也赶不上房价增长预期下，社会的躺平可能使民族丧失奋斗精神，整体上损害整个民族的优良品格。

那么现下中国的住房价格是否存在泡沫？为什么近些年房价持续快速增长？其未来走势如何？对于这些较难判断的问题，本文试图给出分析。

住宅作为一种耐用消费品,满足了人们的居住属性,同时其又有投资的属性,是一项金融资产。从中短期来看,投资属性主导着房价,而从长期来看,居住属性主导房价走势。

从投资属性看,房价是其未来可以获得的现金流的折现,这包括了将其出租可以获得的净租金,以及未来将其出售时的价格。前者取决于经济的整体增长,是比较稳定的部分;而后者则包含了预期的成分。当预期将来房价持续走强时,市场参与者纷纷加入买房行列,从而助推了房价的上升,此即预期的自我实现。理性的预期能使房价回归合理价位,而非理性预期及其导致的羊群效应,则会导致房价的泡沫及虚假繁荣。

房价作为经济增长的租,不可否认,其过去十几年的快速增长,部分反应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然而,从房价租金比及房价收入比等指标来看,房价存在泡沫似乎没有争议。在资本可自由流动的条件下,房价的合理增长应与收入及租金的增长大体相同,而后两者则取决于经济整体的增长速度。因此,理性预期应使房价增长速度与经济体增长速度大体相同。

那么房价只涨不跌的预期是否有其合理成分?市场对房价已绑架中国经济的判断,大体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

(1) 房地产行业直接、并通过其上下游间接拉动GDP,而且贡献很大。房地产成为经济下行期政府的托底政策。

(2) 住房通过住房抵押贷款渠道与银行体系深度绑定。房地产企业的开发模式使其有较高的杠杆率,因此通过各种贷款也与银行体系绑定。房价大范围的大幅下跌会导致银行体系的坏账,可能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进而冲击整个经济体。房地产业大而不能倒。

(3) 地产价格还间接影响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房价的大幅下跌使房产开发的预期利润下降,影响地方的土拍,进而影响地方的财政来源。在多数城市仍依赖于

土地财政的客观形势下,地方政府不会坐视房价下跌。

应该说,市场的判断确实抓到了决策者的难处和痛处,决策者过去的调控都是小心翼翼,发现房价下降迹象马上放松调控,这使参与者进一步印证了其对房价“只涨不跌”的判断。

房价持续上升,决策者终于认识到其破坏力:对中国经济体资源配置的扭曲以及对中国经济未来增长潜力的削弱。而科技爬坡面临的现实困难也迫使决策者认识到必须忍受短期结构调整的痛苦,美国对中国科技进步的遏制也促使决策者下定决心。由以上分析可知,欲遏制房价进一步上涨、泡沫进一步扩大,必须扭转房价上升的预期。欲扭转该预期,必须从根源上切断:即对房地产与金融体系、房地产与地方财政的捆绑松绑。

近来的一系列政策显示了松绑的趋势:

(1) 对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房地产贷款及个人住房贷款比例设定上限,一旦房价下降或房地产企业倒闭,减小银行的损失。

(2) 对房地产企业划定了三条红线,实际上是降低其杠杆率,增加其对风险的抵抗力,促使其健康发展,并减少其破产时对银行的危害。

(3) 对二手房实施“指导价”,“指导价”并不干预市场交易价格,某些地方规定中介网站不能挂牌超过指导价的住宅,这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中介机构利用其信息优势贩卖“焦虑”,恶性改变人们预期。更主要的是,指导价是银行发放个人住房贷款时对住房的评估价,假设指导价300万的房子,在首付三成的假设下,银行贷款210万给个人。在最坏的情况下,房价大起大落,假设市价500万在泡沫破裂后腰斩至250万,抵押品价格仍然高于抵押贷款,银行没有损失。而在没有指导价的情况下,银行贷款350万,泡沫破裂后银行损失100万。因此,指导价等效于将银行体系与将来的房价泡沫做切割。可以看出,美国次贷危机后决策者们反思的宏观审慎监管在中国的实践中出现了新的内容。

媒体聚焦

李承政：希望将中国特色的乡村振兴发展经验推向世界



“做好高校的社会服务板块仍是核心,我们将加强调查研究,为政府部门提供政策建议、咨询服务。除此之外,在学术板块也要有所建树。希望未来关于中国‘三农’问题的学术研究既能发表在国内杂志,也能发表在国际杂志,将中国特色的乡村振兴发展经验推向世界。”暨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助理李承政如是说。

今年3月,暨南大学整合全校优势力量,正式成立乡村振兴研究院。李承政于2017年加入暨南大学,先后在该校经济与社会研究院担任助理教授、副教授(政策研究轨),于今年4月,担任新成立的暨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助理,为广东千村调查课题组专职研究员。他是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博士,研究领域包括环境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在国内外知名期刊发表论文十数篇,曾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广东省软科学以及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四年追踪调查为广东乡村振兴建言献策

李承政向南方农村报记者介绍,广东千村调查项目(以下简称“项目”)是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的王牌项目,也成为了暨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以下简称“研究院”)成立的契机和抓手。据了解,该项目为由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发起,暨南大学社会调查中心与共青团暨南大学委员会共同主办的全省性调查项目,其目的是深入广东乡村进行入户调研,从精准扶贫战略、乡村治理与乡村运行效率、农村生态环境、教育脱贫战略、农村养老和留守儿童、农村金融改革等角度出发,系统地收集广东省乡村发展的微观数据和相关信息,利用一手数据研究“三农”问题,实现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的有机结合,为广东省乃至全国的乡村振兴建言献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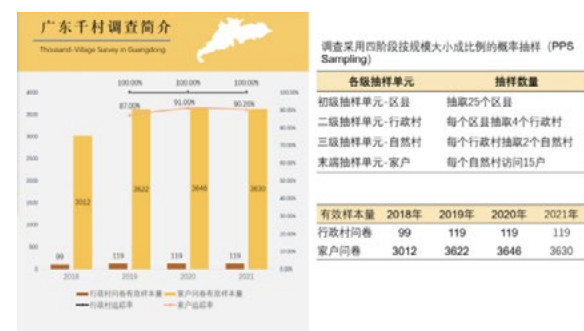


2018年广东千村调查组合影

“从2018年开始,广东千村调查项目已经完成了三年三轮的实地调查及分析,今年第四轮的调查也已经完成,报告预计在12月份进行公布。”李承政向记者介绍该项目整体的规划安排,一般于三、四月份进行问卷调查问题的设置、修改;四、五、六月份在广东省的非样本村进行四轮左右的预调查,从调查的各模块着手逐步

完善调查流程、问卷细节，健全调查规范和质量控制标准；六、七月份开始招募访员并对他们进行培训，访员一般为 18 岁及以上的高等院校在校生。“由于疫情原因，近两年也开始就近招募各地方院校学生。七月到八月我们开展问卷调查工作，同步进行调查质量控制，包括录音核查、电话核查、数据核查等；九月份清洗数据，再次核查；接下来就是进行数据分析，形成报告；一般在 12 月或次年 1 月发布报告。”

同时他强调，为确保问卷的有效性，考虑到语言问题，招募的访员一般为广东省内的学生，在分配队伍时，也会按照访员掌握的地方方言进行分配，如白话、潮汕话、客家话等。截至 2021 年，该项目共采集有效样本量 119 个行政村和 3630 户农村家庭数据，行政村样本追踪率 100%，家户样本追访率达 90% 以上。



广东千村调查简介



受访者供图

据介绍，从连续发布的《广东千村调查 2018 年研究报告》《广东千村调查 2019 年研究报告》《广东千村调查 2020 年研究报告》到围绕乡村振兴话题的 15 期政策简报，该项目从多个角度深挖广东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中的痛点问题，并给出针对性政策建议。项目还把调查访问员、质控员和研究人员等参与者提供的多角度手稿和真实记录汇集成书出版，名为《南粤炊烟——2018 广东千村调查实录调查报告》（2019 年出版）。

“通过四年的追踪调查，可以看到一些比较明显的变化趋势。比如人居环境板块中的厕所、污水，2018 年行政村公共厕所的普及率为 55% 左右、自然村仅为 29% 左右，今年的调查数据显示，行政村的公厕普及率已达到 88%。同样的，以行政村为单位，污水处理设施的普及率从 2018 年的不足 40% 到今年已接近 70%。”他表示这充分体现了广东省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以来的显著工作成效。

“分区域来看，广东省各区域差异明显。”他特地指出，每年的调查问卷会设置两个问题，既不问村干部，也不问家户，而是由调查访员实地观察后填写。“我们要求访员围绕受访农户家中转一圈，回答两个问题，一是住房周围有没有人畜粪污，二是有没有垃圾和污水。通过调查数据可以大概评价该地区整体的人居环境状况，以上两项问题存在的比率，珠三角地区低于 4%，东翼地区低于 5%，西翼地区垃圾污水一项高于 20%、人畜粪污一项超过 10%，北部山区则两项皆为 10% 上下，可以看出西翼和山区村庄人居环境是相对较差的，尤其是西翼，亟需加大整治力度。”

此外，在 2018 年的广东千村调查中，项目组就发现广东省卫生户厕的普及率全国领先，今年最新的调查数据显示家庭户厕普及率为 96%，其中 99% 左右为水冲厕所，公厕管护率也已经超过 80%。李承政表示，调查问卷中关于厕所的问题多达十二个，涉及厕所的粪污处理、设施设备、保洁管护、通水通电等，旨在将问题剖析透彻。他撰写的一项关于广东农村厕所革命的政策建议曾获得省委办公厅采纳。

推动土地流转需谨慎农地非粮化问题

李承政的本科和硕士毕业于华南农业大学，专业为农业经济管理。2017 年，他于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近年来，他陆续进行了一些和农村土地流转、宅基地确权颁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相关的调研研究。



据悉，通过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颁证，依法确认农民土地权利，强化农民特别是全社会的土地物权意识，有助于有效解决农村集体土地权属纠纷，在城镇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切实维护农民权益。2013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全面开展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用 5 年时间基本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妥善解决农户承包地块面积不准、四至不清等问题。

“农村土地确权对土地流转带来了一系列变化。”李承政介绍道，通过调查发现，2011 年广东省少数地方开始试点农村土地确权颁证，2016 至 2018 年集中进行确权颁证工作，到目前为止完成度在 90% 以上。“我们连续追踪调查的家户样本显示，2019-2021 年农村土地转出率从 18%~20% 提升至 27%，转入率从 7%~8% 提升至 11% 左右。土地的流转也带来了生产要素的流动，比如劳动力外出就业、资本的再配置等等。”

他指出一个结论，计量经济分析显示，土地确权颁证显著地提升了农户农地转出率，但并未显著地影响转入率（统计上不显著），意味着有一部分土地流转给了合

作社或农业企业，产生一个潜在的影响，就是农地的非粮化问题。“调查中我们询问了农地转出后的用途，其中一半左右回答农地流出后改变了用途，主要就是种植粮食作物改成种植经济作物，因为种植经济作物收益高。”他强调，在促进土地流转的同时要警惕农地非粮化的问题。



韶关市乳源瑶族自治县

近两年，粮食安全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不少地方开始严格要求种植粮食，但是又会导致农业经营性收益下降，即使有补贴也不如种植经济作物。“从经济学角度，我们希望看到资源的优化配置，即土地交给生产率最高的人来经营，土地自由流转会提高整体的生产率。但是由于新的经营主体如合作社、企业等加入，他们往往追求利润最大化，会倾向于种植经济作物，从粮食安全角度来看，没能保障社会福利最优和国家安全。在广东省，土地完全改变用途的比较少，因为我省气候条件能够支持一年两茬甚至多茬，可以实现在完成种植水稻任务的基础上再种植经济作物。但在其他省份，改变耕地用途种植经济林业、灌木林业的现象比较突出。”

农村宅基地确权颁证工作的开展稍晚于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2019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将加快推进宅基地使用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力争 2020 年基本完成农村宅基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稳慎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拓展改革试点。李承政在广东省进行了宅基地确权的调查研究，发现一些突出问题。

一是“一户多宅”问题，由于各种历史和文化原因，广东农村普遍建新房不拆旧房，导致一户占有多处宅基地。二是没有达到“房地一体”的要求，由于村内不规范的宅基地流转，以及部分农户在荒地、集体建设用地上乱建房屋，导致“房地分离”。三是宅基地面积超标，宅基地的标准面积基于各地实际情况确定，调查发现，有些农户自报的宅基地面积远远超过宅基地确权登记证（不动产权证书）上的面积，实践中超标部分通常不予确权。尤其是粤西地区，户均、人均宅基地面积大且超标面积大。四是确权难度大，宅基地确权颁证工作按照不同年代颁布的政策文件（时间点）操作，其中的难点在于以前村民建房子不会向自然资源部门报建，无法得知准确的建造时间，导致难以按照规章制度操作。“目前为止，广东省完成宅基地确权并拿到证书的村民比例不到一半，这些难点问题，还需逐步攻克。”李承政说道。

高校智库成为联结学术与政策的桥梁

对于接下来的工作规划，他表示将继续参与推进广东千村调查项目，提升社会影响力，加强项目数据的追踪形成长期面板数据集，未来还要提升学术影响力。研究院未来也有两个方向的拓展目标，一是服务广东各地方，分区域、针对性开展专题调查研究。二是加强与省外的合作交流、多学习多调研。

“做好高校的社会服务板块仍是核心，我们将加强调查研究，为政府部门提供政策建议、咨询服务。除此之外，在学术板块也要有所建树。希望未来关于中国‘三农’问题的学术研究既能发表在国内杂志，也能发表在国际杂志，将中国特色的乡村振兴发展经验推向世界，比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很多国家在做类似的工作，但力度不如中国大，成效也远不如中国显著。”李承政对未来踌躇满志。



“暨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既要进行学术研究，也要提供政策建议，鱼和熊掌兼要，某种意义上存在矛盾。但是高校智库的一个优势是，能够将学术与政策串联，打通学术界和政策界。不仅能将政策实践凝练为学术理论，提升高度对外推广；而且可以将学术成果落地转化为政策、达成落实，服务社会，发挥着重要的桥梁作用。”他总结道。

刘诗濛接受《南方日报》采访， 解读广东前三季度经济数据



编者按：

近日，广东 21 个城市的前三季度经济数据陆续发布，汕头、佛山等 12 个城市 GDP 同比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广州、深圳 GDP 超 2 万亿元，佛山、东莞超 5000 亿元，惠州超 3000 亿元，珠海、中山、江门、茂名、湛江超 2500 亿元。

从“一核一带一区”来看，沿海经济带东西两翼 7 个城市合计 GDP 同比增长 10.6%，比全省平均增速（9.7%）高 0.9 个百分点，北部生态发展区 5 市合计 GDP 同比增速 9.7%，与全省持平。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刘诗濛认为，前三季度，广东多个城市经济数据表现亮眼，呈现“多点开花”趋势，各个区域的经济增长模式各有特点，体现了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取得阶段性的成效。

以下为报道原文：

科创产业焕发新活力，经济韧性强

前三季度，广州和深圳的同期 GDP 首次双双突破 2 万亿元。佛山约 8500 亿元，东莞接近 7700 亿元，四座毗邻的超大、特大城市合计 GDP 约 5.8 万亿元。

依托科创产业发展，广州正焕发新的发展活力——前三季度，广州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28.1%，两年平均增长 16.7%。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了 58.8%。

10 月 22 日 22 时，广州中新知识塔提前 40 天完成大底板浇筑工程。几天后，《〈中新广州知识城总体规划（2020—2035 年）〉实施方案》发布，这里将构建世界级知识密集型产业体系，在新能源智能汽车产业链、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链、集成电路产业链布局方面皆有重大动作。

前三季度，深圳 GDP 同比增长 7.1%，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8%，创新产业表现出强大韧性，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

华为在多个领域找到新的增长引擎。如新能源领域，2020 年全球光伏逆变器接近四分之一出自华为。日前，在中东的沙特，华为与另一家国内企业共同签约了迄今为止全球规模最大的储能项目。

更多高技术企业也在深圳加速崛起，前三季度 TCL 华星光电、鹏鼎控股等企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79.3%、46.2%，其中华星光电 T7 项目对深圳工业投资增长拉动作用显著。

在加快培育新动能的过程中，广州、深圳实现通力合作。广州坐拥多所双一流高校，基础研究、产业配套能力强，深圳有 1.86 万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超 5 万家科技型中小企业。此前，在广州、深圳“双城联动”论坛上，广深签署双城深化合作专项协议，涉及科技创新、智能网联汽车产业、智能装备产业、生物医药产业等领域。前三季度，小鹏新能源、乐金显示、天珑能源、荣耀终端等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速均超过 100%。

“外贸跟科技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刘诗濛认为，广州和深圳经济韧性强的原因在于产业升级让经济新动能不断增强，未来应通过技术革新加快推动外贸和产业转型升级。

东莞冲击万亿元

工业投资支撑力强，发展后劲足

2019 年，佛山 GDP 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2021 年前三季度，东莞 GDP 接近 7700 亿元，同比增长 9.1%，有望成为广东第 4 座 GDP 万亿元城市。

“东莞的工业基础相对稳固，工业效益比较好。”曹宗平说，东莞通过实施企业“倍增计划”，从土地资源空间、金融支持等方面助力企业发展，为前三季度的工业增长提供了良好的基础，特别是市场主体增长快，显示经济发展后劲足，也为全年经济发展目标的顺利完成提供充沛动能。

今年年初，东莞提出，推动松山湖生物医药产业基地、东部智能制造产业基地、东莞新材料产业基地等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建设，多维发展，提升产业的综合竞争力。东莞市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9 月末，全市工商登记注册户数 142.12 万户，同比增长 8.3%。新兴产业 6.39 万户，增长 17.6%。

“粤港澳大湾区整体都在飞速发展，其中东莞非常值得期待。”刘诗濛说，未来需要进一步发展高科技产业，推动产业转型，增强经济韧性；在经济发展有优势的情况下，尤其要注重科研教育，要成为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的高地。

依托制造规模优势向中高端跃升，正在广东蔚然成风。

从全省看，前三季度，全省工业投资同比增长 21.1%。其中，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加快，同比增长 22.9%，工业技改投资同比增长 16.1%。

以惠州为例，前三季度工业投资增长 45.6%，增速排名全省第 1 位。重点工业建设项目带动效应明显，同期该市电子行业增加值增长 17%，两年平均增长 9.9%；先进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17.6%、17.7%。

东西两翼增速快

与大湾区接轨，协调发展成效好

前三季度，沿海经济带东西两翼 GDP 合计约 11779 亿元，同比增长 10.6%，增速超过珠三角核心区和北部生态发展区，在全省经济比重由上半年的 13.2% 提升到 13.4%。

汕头紧抓契机，全力推进规划面积约 398 平方公里汕头临港大型工业园的建设。工业园将充分发挥临海临港优势，以新材料、生物医药与健康、新一代电子信息为主导，以智能产业为特色。与此同时，新旧动能加速转换，汕头传统的玩具、服装等产业开展集群数字化转型试点，形成 3 个产业集群标杆，正在创建省级数字创意产业园。

“汕头等市的快速发展与其产业培育、转型成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刘诗濛说，同时要注意与粤港澳大湾区接轨，协调区域发展。

前三季度湛江地区生产总值为 2510.31 亿元，同比增长 10.5%，增幅高于全省平均水平（9.7%），特别是工业生产保持高位增长，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22.3%，增速排名全省前列。

在湛江东海岛，湛江钢铁、中科炼化、巴斯夫三个总投资逾 2000 亿元的“巨无霸”项目依次排开，以这些重点骨干项目为龙头，湛江正在高端制造、环保节能、精细化工等多个领域补全产业链。

北部生态发展区对全省经济增速的作用也在提升，贡献率由一季度的 5.1% 提高到三季度 5.8%，经济总量占全省比重也呈上升趋势。

毗邻广州的清远，一方面将先进材料、装备制造、轻工消费品三个产业作为发展方向，另一方面推动水泥、陶

瓷、有色金属等当地传统优势产业紧跟数字化变革。当地的冠星陶瓷投入 1.7 亿元，中国建陶产业首个、全球第 2 个超高立体式智能化仓储中心正在加紧建设。

本文首发在《南方日报》

暨济一堂

温铁军：“三新”思想下的生态化乡村振兴



中国“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十四五’时期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2021 年 11 月 11 日，立足“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暨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首席研究员温铁军教授发表题为“‘三新’思想下的生态化乡村振兴”的精彩学术报告。

温教授开宗明义的提出新理念的核心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两山”理念。于此之下，“绿水青山”乃至“山水田林湖草沙”等生态空间资源作为新生产力要素极大的扩展了除土地、劳动力、资本之外的要素结构。经济结构决定于要素禀赋，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经济增长的潜力以及开发的动力机制。新的资源形态和要素结构将极大的推动中国转型到绿色高质量的“生态经济”发展方向上。

由此，绿水青山等生态空间资源作为整体的、系统的“区域经济”所蕴藏的巨大价值潜力正日益显现，将是中国应对全球化危机进而实现国内大循环的战略性调整的核心动力。

而新的发展格局要坚持“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的深改路径，立足乡村振兴战略推进构建新型县域经济的生态化新发展格局。首先要通过深化城乡融合及质量效益型要素市场改革将生态空间资源价值化。据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宁介绍，过去这些年中国基本建设投资已形成超过 1302 万亿的全国总资产，中国稳态结构奠基基于巨额实体资产去替代乡村振兴需要的重资产投入，农村有几百万亿沉淀资产亟待生态化乡村振兴中激活。同时也要注意县域生态经济的不同定位及相应的市场价值，放弃“粗放数量型增长”。再者，要通过农业六产业化（农业、工业、旅游业、自然教育、生命产业、历史传承），实现多业态的集成创新。另外，农业低效压力下的土地闲置与粮食对外依存度增加，都造成国家和社会的综合安全问题。对此，不能仅仅要求农民承担责任，而要把推进多业态的“社会化生态农业”作为贯彻城乡融合战略的重要内涵，发动更多市民群策群力参与三农发展，形成城乡互补、协调发展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随后，温铁军教授指出，“两化”推动了生产关系变革，空间生态资源再定价要同城乡融合战略及重构新型集体经济整合协调。首先，农业 4.0——空间资源价值化带来深化农村要素市场改革的契机。空间资源“整体性”、“非标性”与“公共性”特征会带来定价难题，所以，空间资源要进行立体整全开发，需要建立新生产关系。再者，通过集体经济公司化改制可以实现空间资源“双层 PPP”开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态空间资源要素综合系统开发，重点要重构新型集体经济向公司化的社会企业转型。

最后，温教授进一步阐释，“生态资源价值化”要落在县域金融与农业两大供给侧改革相结合的措施之中。以陕西留坝县村级扶贫合作社组织架构为例，他介绍了扶贫开发有效衔接的深改要点——官方重资产转交村集体代持，农民轻资产介入。这一要点的必要性在于，一是产业兴旺需要把扶贫投资形成的资产做股到村集体及合作社成为“重资产主体”，才能撬动村民做“轻资产”经营；二是县投资公司占股 20% 并承担县域产业的主要风险，才能使农民低风险分享产业收益，成为生活富裕的保障；三是治理有效和乡风文明都要求以集体对村民的股权分配为基本手段；四是生态宜居是全域生态化为基础的康养需求所内生的。其次，要利用举国体制下的金融支农制度创新促进“资金链内化产业链”，进而实现生态资本深化。农业的自然属性派生社会与生态包容性，而商业金融追求流动性获利内生排斥性，二者长期矛盾在于各自制度体系的自我强化，占据主导地位的金融部门异化于分散细碎的农业。基于这一背景，最近 10 年的三大供给侧改革，中央注重强化乡村振兴的战略地位，促进金融下乡，实现了服务性普惠，正在深化信贷普惠，具体模式有融汇模式、政银担模式、保期银模式。

王伟正：广东三农调查案例



2021 年 9 月 30 日上午，暨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乡村振兴大讲堂”系列讲座第 9 期于曾宪梓科学馆 406 会议室顺利举办。南方农村报深度新闻部主任王伟正受邀担任本次讲座嘉宾。王伟正是三农媒体智库的带头人，其带领团队率先在广东将第三方评估机制引入到乡村振兴领域，并且带领团队实地走访超过 1 万个村庄，足迹遍布 21 个地级市的 122 个县（区、市）。在本期讲座中，王伟正就广东省三农调查的案例进行了详细介绍。



南方农村报深度新闻部主任王伟正

王伟正以中央政府关于发展媒体智库的政策文件为引，介绍了媒体智库发展的初步探索和现实需求，并且介绍了媒体自身的独特优势。接着，王伟正就 2017 年以来媒体智库在推动相关问题的解决或对相关政策的完善起到的积极作用进行举例分享。第一个案例是禽流感调研报告和县域房地产调研报告。禽流感爆发之际，广东各

地存在休市时间过长、休市措施临时突击等问题，王伟正团队的报告较好地解决了上述问题。县域房地产开发问题较多，包括违规用地和验收、监管不力等问题，引发不少群众上访，通过团队调研撰写报告，高层听取意见后颁布政策也解决了相关问题。第二个案例是关于人居环境整治的调研报告。他们根据实地调研素材写成上下两篇调研报告，对人居环境治理问题的深入解决起到了积极作用。第三个案例是关于精准脱贫的调研报告，王伟正团队围绕脱贫标准“八有”随机入户访谈了 546 户贫困户，获取了大量来自一线的鲜活素材，让典例和数据说话，反映真实民情。第四个案例是关于珠三角窝棚整治调研报告。王伟正团队深入广州、东莞、佛山、中山等珠三角核心区开展田间窝棚整治调研工作，共走访了 25 个镇（街）43 个村（居），为报告的撰写提供了大量的一手资料。第五个案例是关于农村污水治理现状的报告。团队共花了三四个月的时间，实地走访了 2014 个自然村，获取了实地的详实数据，比较准确地摸清了广东省农村生活污水的现状，推进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问题的解决。

最后，王伟正给广大师生们分享了广东省首创的乡村振兴领域第三方评估方式。以往政府的绩效评估以部门自评、同级互评或上级评价下级的内部评价为主，这种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评估方式有诸多弊端。而第三方评估兼具独立性、专业性与公正性等特点，能有效促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南方农村报自 2018 年以来开展了多次乡村振兴的第三方评估工作，打响了第一炮。现如今，南方农村报撰写超过 50 份、共计 100 多万字的各类评估调研报告。最后王伟正就媒体开展三农调查的特点进行了简单介绍。

本次讲座王伟正给师生们分享了三农调查案例报告，又和同学们介绍了第三方评估机构在乡村振兴领域发挥的积极作用，讲座的尾声同学们积极提问并得到反馈，受益匪浅！

刘西川：新时期的农村金融理论：现实回应



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是“十四五”时期的重点建设任务，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制度保障。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体系在取得重大成绩的同时，仍面临着诸多困境和挑战。2021年10月22日下午，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刘西川教授，受邀担任暨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乡村振兴大讲堂”系列讲座的第10期主讲嘉宾。本期讲座为线上讲座。

刘西川教授本次讲座的题目是“新时期的农村金融理论：现实回应”，讲座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农村金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挑战及其对发展农村金融理论的要求；第二部分是农村金融理论重构的三个重要内容：范式转变、基本内涵及逻辑思路；第三部分是从研究服务于实践出发，提出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构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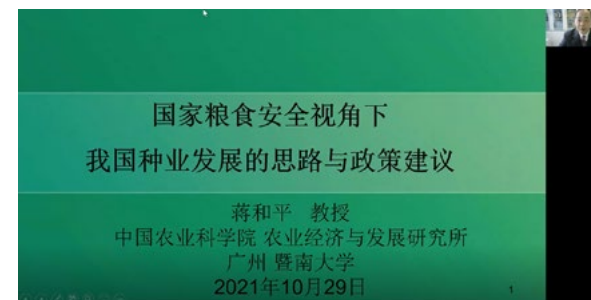
在第一部分，刘西川教授首先指出了农村金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挑战。如农业融资需求已经从单一的小额、短期信用贷款向商业化、资金额度增大、期限延长等方面发展，并向包括农业保险、融资担保、融资租赁等在内的多元化需求转型；农村金融领域传统授信模式和风控手段，制约了农村金融整体风控水平的提升。然后，刘西川教授从非政府小额信、城商行小贷项目、农业产业链融资、农村互联网金融、数字化普惠金融等五个方面总结了我国农村金融创新的历史经验。他认为，农村金融既有理论认识难以跟上实践发展的步伐，中国农村金融市场难以应对中国农村新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市场

化不够”。根据对现状与历史经验的比较，刘西川教授对农业金融、普惠金融、绿色金融的实践发展与理论推进做出了基本研判：资源配置与风险管理已成为农业金融市场发展的主旋律；普惠金融仍需从理论上研究普惠金融市场构建的运行机理及完善路径；绿色金融虽是刚起步的新事物，但也是大势所趋。

在第二部分，刘西川教授详细阐述了农村金融理论重构的范式转变、基本内涵及逻辑思路。农村金融旧范式强调以补贴信贷和国有金融资本为主导，新范式更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鼓励市场竞争。他认为，新时期农村金融研究需要实现发展经济学到现代金融学的研究范式转变，在构建新的农村金融理论的过程中，应强调金融的资源配置与风险管理基本功能；金融市场体系在“三农”领域资源配置中所起的核心作用，不仅仅是提供资金满足融资需求，更重要的是通过资产定价为企业和个人等的经济决策提供客观的评估依据。在此基础上，刘西川教授提出了推进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的逻辑思路，即风险定价的市场化、组织治理的市场化、市场融合的市场化以及政府支持的市场化。

在第三部分，刘西川教授提出了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构想。一方面，市场化是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战略构想的主线索，构建与农业农村发展相匹配的、能更好地服务农村地区经济社会环境发展的农村金融市场体系，其核心是进一步深化和推进市场化。另一方面，农村金融是一个由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组成的多层次体系。针对中国农业和“三农”问题的特殊性，有必要采取分类实施和分层推进思路，在解决坚持市场化的框架下解决不同细分市场的资源配置和风险管理问题。

蒋和平：国家粮食安全视角下我国种业发展的思路和政策建议



粮食安全是世界尤其是中国这一农业大国的历史与时代使命，而种业安全是粮食安全的突破口。中国种业市场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种业市场，然而其发展却面临着一定阻力。2021年7月9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种业振兴行动方案》，再次对种业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明确了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的总目标。如何针对当前种业国内外形势，更好解决种业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议题。2021年10月29日，中国农科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二级教授、现代农业学科首席科学家蒋和平教授作客我院“乡村振兴大讲堂”活动，从国家粮食安全视角下出发，探讨了我国种业发展所面临的六大问题，辅以典型案例的分析，最后提出中国种业发展的出路与对策。

首先，蒋和平教授介绍了中国种业发展的现状。他提出，一方面，目前我国对种质资源的保护利用程度逐年加强，科研水平不断提升。具体来说，例如国家设立水稻、小麦、玉米、大豆主要粮食作物的绿色品种示范点，在15年间使农作物良种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提高9个百分点。而另一方面，种业市场的供给能力不断增强，企业间的兼并重组加快，并更加重视科研投入和专业化分工，使企业要素配置更加集中在优势领域，并使种子企业结构呈现多元化趋势。

然而，蒋教授认为，虽然近年来我国种业在国家政策扶持下有较快发展，但在全球化进程及严峻的国际种业竞争形势的背景下，我国面临着种业科技创新和经营发展的六大新问题。蒋教授以80年代美国科学家在中国“北京黑小豆”的遗传资源中找到抗大孢囊线虫病的基因，挤压中国大豆市场为例，说明中国存在农作物种质资源与种质资源研究薄弱的问题。除此以外，种子行业的科技创新体系不健全，具体表现为国内育种资源分布较分散，中央和地方之间、科研院所和企业之间、科技创新各环节内以及与市场需求的衔接不紧密、分工不明确等问题。接着，蒋教授通过分析美国杜邦先锋公司的玉米品种成功推广的例子，说明了中国种业的前沿生物技术竞争力不足，面临着被外资控制的巨大隐患。最后，蒋教授从市场角度出发，提出我国农作物优良品种与售后服务模式落后的观点，并指出农作物育种的知识产权保护过于滞后。

最后，蒋教授基于以上问题，提出新时代应树立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为目标的种业发展新思路和政策建议，着重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重点：

一是构建中国种业科技创新和特色商业化育种新机制。同时改革种业科研考核体制，鼓励优秀科研人员到种业龙头企业兼职任职，采用报备名额制+双聘+任务聘用相结合的用人制度，灵活配置人力资源。

二是构建种业科研攻关靶向招标制。针对粮食作物的重大攻关育种核心技术，进行市场化靶向招标具有较大的应用价值。

三是构建种业人才培养机制。一是注重种业人才的培养，将培养引进种业科技人才、专业育种团队作为核心战略，充分发挥种业领域领先人才和杰出人才的引领作用，加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创新计划、种业领域人才工程和农业农村部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等科技项目和课题的培养人才力度。

四是构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制定种业知识产权管理法律法规，形成权责统一、运行有序的种业管理体制。同时尽快修订《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将转基因品种、自交作物品种纳入植物新品种保护。我国应考虑适时加入《UPOV 公约》1991 年文本，完善我国品种权保护界定，强化对原始创新品种权人利益的保护。

五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种业发展既要注重供种数量安全，又要重视种子质量安全。一要发展绿色、生态、安全、优质的水稻和小麦。依靠分子育种技术，选育环境友好型、资源高效利用、抗逆性强的水稻和小麦品种。二要重点发展适用于机械化操作的小麦和水稻。

六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点应破解和消除种质资源引发的国家种业源头安全风险。

七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点应在育种基础研究和关键技术上有所突破，主要在粮食育种基础理论、育种攻关技术和生物智能育种技术上有突破，为发展壮大国家粮食育种产业提供关键性技术支柱。

八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点应在发展生态高值粮食育种产业上有所突破，发展生态高值粮食育种产业，是“十四五”时期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一个重点突破领域，也是我国现代种业科技创新重点突破的方向。一方面利用新育种技术和新生物技术培育出富硒、富锌、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的水稻和小麦新品种。另一方面在追求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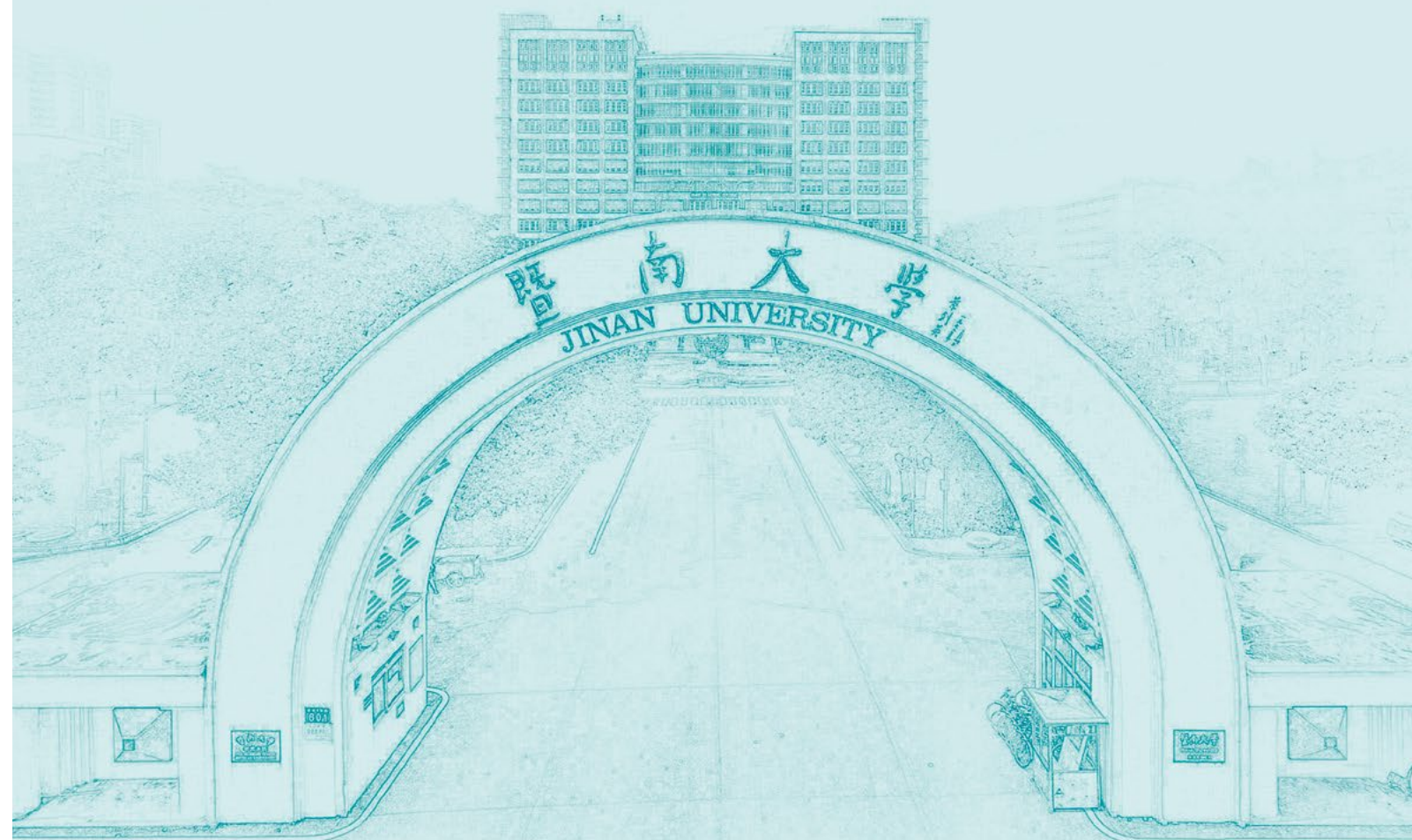
态高值粮食高产的基础上，更加重视其品质、功能和效益，要加快培育生态绿色、环境友好、资源高效、优质特色和高附加值专用，以及适宜轻简栽培和粮食作物机械化生产方式等突破性新品种，重点培育优质功能水稻、降糖降血脂的小麦、优质蛋白玉米等重要功能粮食作物新品种。

在新的粮食安全观主导下，构建新时代我国种业安全可持续发展体系，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的长治久安奠定坚实基础，蒋教授提出了七条政策建议：

一是科学编制我国种业“十四五”发展规划，二是加强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体系建设，三是加快推进种业科技平台建设和建设国家现代农业种业创新中心，四是建立国家现代种业专项资金，五是建立种业全产业链服务体系，六是逐步建立和完善我国制种业的保险制度，七是以电子商务和数字化强化现代种业发展的动力。

最后，蒋教授与我院师生进行了深入的学术交流，探讨有关我国农业和种业发展多个问题，受到我院师生的高度评价和认可。

数据 调查



中心要闻

第二届暨南 - 绵竹 “教育与发展”名家论坛顺利举办



2021年10月10日，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与四川绵竹市教育局共同主办的第二届暨南 - 绵竹“教育与发展”名家论坛在四川师范大学附属绵竹小学校顺利举行。上海市特级教师、特级校长程红兵与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宋映泉受邀担任主讲嘉宾，他们分别以“回流儿童的起源、规模及发展挑战”和“面向未来，重构课堂”为题作主旨演讲。“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冯帅章基于与绵竹市教育局合作开展的“绵竹儿童认知与非认知能力发展追踪项目”调查数据分享了近年来关于儿童早期能力发展的研究成果。

绵竹市委教育工委书记、教育局局长刘强，绵竹市教育局副局长卢世军，绵竹市正高级教师谭克，绵竹地区各学校校长及多位深入乡村振兴与基础教育的一线工作者代表参加了此次论坛。绵竹市教育局副局长卢世军担任本次论坛主持。



卢世军副局长（左）、刘强局长

会议伊始，绵竹市教育局局长刘强为本次论坛发表致辞。刘强首先代表绵竹市政府、绵竹市教育局和绵竹市教育委员会对参加本次论坛的专家和来宾表示热烈欢迎。讲话中，他对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长期以来对绵竹当地教育发展作出的积极贡献予以高度肯定和衷心感谢，并期望借此学习机会以智启智，让暨南和绵竹两方携手，以更加专业的力量深耕教育理论与实践，让

教育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绵竹人民。最后，刘强预祝本次论坛圆满成功。

紧接着，冯帅章院长代表研究院颁发聘书，敦聘绵竹市正高级教师谭克为绵竹儿童认知与非认知能力发展追踪项目顾问。

仪式后，冯帅章院长分享了谭克老师、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赫克曼教授与绵竹项目的结缘过程，高度肯定并真切感谢谭克老师对绵竹项目及绵竹教育事业作出的贡献，并希望谭克老师今后能继续指导和支持绵竹项目的开展，为绵竹项目献计出力，一如既往地为中国教育事业发光发热。



冯帅章院长（右）为谭克老师（左）颁发聘书

【主题讲座一】 程红兵：面向未来，重构课堂



上海市特级教师、特级校长程红兵在演讲中以外貌描写为主题的小学作文课为例，用风趣幽默的语言层层递进地“演示”教师如何进行课程内容的重构和学科知识的重新组合，以及如何引导学生面向真实而多彩的实际生活，关注复杂的社会系统，提高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和学科应用能力，提升学生综合素养。

在程红兵分析的“作文课堂”中，学生作品揭示了目前大部分的语文写作课程缺乏对学生明确写作目的和写作对象的引导。其次，教师需要让学生“进入”到真实的社会化场景去学习知识和解决问题，从而唤起学生的学习热情。

此外，目前教育体系中，学科各自为阵，教师可积极尝试引导学生感受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通过主题教学打通学科壁垒，让学生学会综合应用知识解决问题。主题讲座内容翔实，富有启发性，在场的绵竹教育工作者纷纷表示有所收获。

【主题讲座二】 宋映泉：回流儿童的起源、规模 及发展挑战



回流儿童是一个受限于升学政策或城市人口疏解政策，选择离开大城市，返回家乡读书的特殊的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群体。这个群体伴随着城镇化和人口流动而产生，近十年来开始得到学界、公众和媒体的关注。政府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开始关注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在户籍制度、教育财政制度、和异地高考/中考制度等方面都出台了大量文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目前仍未根本性地解决回流儿童的产生。

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宋映泉副研究员指出，城市公办学校入学门槛增高、打工子弟学校被关闭、中高考升学考试刚性需求、父母外出务工地点转移等是当下回流儿童产生的主要原因。而回流儿童的规模目前并没有进行官方科学统计，据北大研究团队粗略估计，跨省流动的回流儿童群体规模在700-1000万之间；

如果算上省内跨县流动，或者出生在外地没有上学就回到老家的儿童，那么，回流儿童总规模会比这个估计大很多。

据北大研究团队于 2015 年在河北和四川两地的农村寄宿制学校四五年级学生调查数据发现，回流儿童整体有着较好的家庭背景，大多是低学龄回流。若儿童在城市适度状况较好则回流适应较差，而有父母陪伴、低年级回流及回流前成绩较好的儿童回流后适应和发展得更好。

通过儿童案例，宋映泉点明回流儿童在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学业发展、人际关系等方面面临严峻挑战，如睡眠质量更差、高抑郁风险、低自尊、更有可能实施或被校园欺凌、阅读理解力较低和更易发生留级情况等。

宋映泉认为，各级政府及学界应当尽早认识到回流儿童问题的重要性和严重性，积极进行形势研判和科学决策，从制度上消除回流儿童产生的根源。而现行制度下，政府、学者、学校、家长和社会组织各方应对回流儿童群体进行密切关注和适当干预，引导其健康发展。

至此，第二届暨南 - 绵竹“教育与发展”名家论坛在与会者阵阵掌声中落下帷幕。受邀出席论坛的教育名师、专家学者在本次论坛中围绕儿童早期发展和教育策略分享了前沿研究成果和创新教育实践案例，精彩而充实。今后，我院将继续深化与四川绵竹市教育局的合作，积极将研究成果转化实际应用。同时，我院将更加注重开放协同，以高水平、高质量的智库成果及微观数据助力绵竹教育的长远发展，为中国教育事业提供切实研究保障和智力支持。

第五届社会抽样调查理论与实践研讨会顺利举行



2021 年 11 月 26 日，由西南财经大学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暨南大学社会调查中心联合主办，暨南大学社会调查中心承办的“第五届社会抽样调查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在广州暨

南大学顺利举行。本届研讨会采用线下与线上相结合的形式开展，会议主题为“后疫情时代的调查技术与理念发展”。

会议当日，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暨南大学社会调查中心主任冯帅章教授出席开幕式并致辞。线上线下共约 300 位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南财经大学、云南大学、中南大学、内蒙古大学等高校及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和调查行业同仁参加了本届研讨会，围绕后疫情时代特点，深入探讨和交流社会调查一线形成的新经验、新做法和新成果，共促中国社会调查高质量发展和微观数据库高水平建设。

致辞中，冯帅章院长表示，2021 年新冠疫情反复，给社会调查行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共面新冠疫情考验，需要调查行业各方汇智聚力，并肩前进。希望国内社会调查同行以研讨会为起点，通过长远、深入、高水平的学术交流和科研合作，精准把握发展趋势，行之有效地推动成果创新与转化，并为中国数据建设与学术研究提供坚实有力的支撑。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暨南大学社会调查中心主任冯帅章教授致辞

主旨演讲部分，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主任甘犁教授作题为“迈向共同富裕的路径选择”的研究成果分享。通过对比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OECD）国家与非 OECD 国家、世界与中国的社会保障支出情况，甘犁指出我国目前的公共转移支付体系中，以职工养老保险为主的城镇地区养老保险体系对缩小老年人收入差距起到重要作用，但社会保障体系对低收入劳动年龄人群补助支持不足，需要适时推出符合我国国情的劳动激励方案。



甘犁与参会嘉宾进行讨论

北京大学企业大数据研究中心主任张晓波教授介绍了所在团队开展的中国企业创新创业调查、小微经营者调查 2021 年开展情况。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副主任王卫东副教授作题为“传统社会调查面临的挑战与思考”的演讲，梳理中国社会调查的发展历程、成就和目前发展短板，建议在学术调查中加强传统面访以外其他调查手段的应用。

分场会议中，多位专家学者和调查行业一线工作者进行了网络调查设计、访问员筛选与管理、调查数据质量评估、调查规划等方面的经验分享和成果汇报。暨南大学社会调查中心执行主任何李芮在会议上分享了基于 2021 广东千村调查收支数据的质量评估思考。



研讨会现场

研讨会的最后，暨南大学社会调查中心何李芮对本次研讨会进行了总结致辞，并与内蒙古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学系主任、副教授侯建昀老师进行了第六届社会抽样调查理论与实践研讨会的交接仪式。何李芮表示，此次交流与学习为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社会调查开展提供了详实细致的业务场景示例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参考。感谢各位社会调查领域专家和一线工作者对于本次研讨会的积极支持，并期待在后续的学术交流和科研合作中共同促进调查行业高质量发展。

至此，第五届社会抽样调查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此后，暨南大学社会调查中心将继续以高校地域、科研特色为依托，扎实开展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社会调查项目，积极与各方进行高水平交流，稳中提质，切实做好学术交流和微观数据收集工作，为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真实、可信、有力的数据支撑和智力支持。

绵竹儿童认知与非认知能力发展追踪项目

绵竹调查动态：项目组顺利完成绵竹 13 所中学入校调查，并在当地两所小学开展预调查

12月3日至13日，暨南大学社会调查中心绵竹儿童认知与非认知能力发展追踪调查项目组前往四川绵竹，在当地13所中学和2所小学开展入校调研和数据收集工作。这是绵竹项目开展的第五轮入校调查。

今年，为进一步深化儿童早期发展研究，项目组一方面对过往样本开展追踪调查，正式调查对象调整为初中一年级、初中三年级和高中一年级的学生、监护人及班主任。另一方面，项目组对当地两所小学的一年级学生进行纸质问卷预调查，并组织家长到校开展网络问卷调查，了解绵竹当地低龄儿童的发展情况。这也是绵竹项目访问工作首次覆盖高中学校和小学低年龄段学生。



访问员指导高中受访者填写问卷



项目组在小学开展预调查

调查工具方面，项目组根据调查经验、学生成长情况及业务场景变化，在初中和高中阶段推行全电子化调查，以避免人工录入而导致的数据误差，提高数据采集效率。一年级学生问卷设计中，项目组在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研究团队的指导下，根据现有低龄儿童调查问卷作适龄化和本土化修改。

在绵竹市教育局和绵竹各学校的支持下，绵竹项目加大调查设备投入，精简入校调查团队，以灵活高效的执行模式在近两周的调查中回收约4800名学生及其监护人、班主任的问卷数据，年总样本量近8000人次。



初中调查现场

SEMINAR 回顾

“蓝信封”周文华：留守儿童心理支持的一线实践，13年的探索之路



10月22日，受暨南大学社会调查中心邀请，蓝信封留守儿童关爱中心理事长周文华担任“社会调查与应用”系列讲座第二十七期的主讲人，与参会师生们分享了“蓝信封”项目的发展历程和项目团队在留守儿童成长帮扶过程中的实践收获。

周文华，中山大学博士，“蓝信封”留守儿童关爱中心创始人、负责人，全职公益从业者。2008年受一则“留守儿童自杀”的新闻触动而发起“蓝信封”书信陪伴活动，至今已在该领域深耕13年。

“蓝信封”项目的服务对象是10-14岁的乡村儿童，主要针对初一的在校学生。这一群体处于青春初期，

学习环境改变、学业压力增大，开始与父母的相处变得微妙，逐渐从家庭体系出来，又还未完全融入社会，有较强的感情倾诉需求。

那么信是怎么写起来的呢？首先，选点学校的乡村儿童在观看项目介绍影片和听取班主任的介绍后自愿报名参加书信笔友活动。报名后，“蓝信封”项目团队根据他们多年工作经验设立的配对机制，将儿童与通信志愿者一对一结对，并开展持续三个学期、每月一封信的沟通活动。在“蓝信封”这样一个相对安全和私密的倾诉空间，儿童通过与志愿者书信往来，互相分享学习和生活经历，锻炼了自身情感表达和认识加工能力，并从中获得丰富的外界信息和积极向上的榜样力量。

在志愿者招募方面，“蓝信封”设立了严格的筛选机制。志愿者报名后需要通过理论考试、个人信息审核和模拟通信三轮考核，方可成为通信大使。他们主要由两部分人群组成，一部分为在校大学生，另一部分为社会人士。项目每年会通过高校公益社团和企业公益部分开展志愿者招募，并提供书信个案分析、留守儿童和青春期儿童心理认识、心理压力纾解等模块的培训，组建符合陪伴要求的志愿者队伍。



讲座现场

到目前为止，蓝信封已经形成了超过 43 万封“飞鸽传书”，联系了将近 3 万名留守儿童，服务的乡村学校和儿童主要分布在河南、湖南、四川、广东、云南等地。在书信传递的过程中，他们不仅倾听了孩子们内心的声音，交流对于生活、学习的看法，解答一部分他们在成长过程中的困惑，甚至发现他们在心理层面的不良倾向，及时向他们的学校和老师预警，从而降低极端不良事件的发生。

在讲座的最后部分，周文华现场选取三名师生朗读节选的儿童信件，演示如何解读字里行间的儿童心理状态和情感需求，并阐释青春期少年群体出现心理问题的原因和应对措施。通过相关通信数据和评估报告，周文华还展示了“蓝信封”项目从通信次数、配对性别、志愿者来源、志愿者表达水平等因素与书信疗愈效果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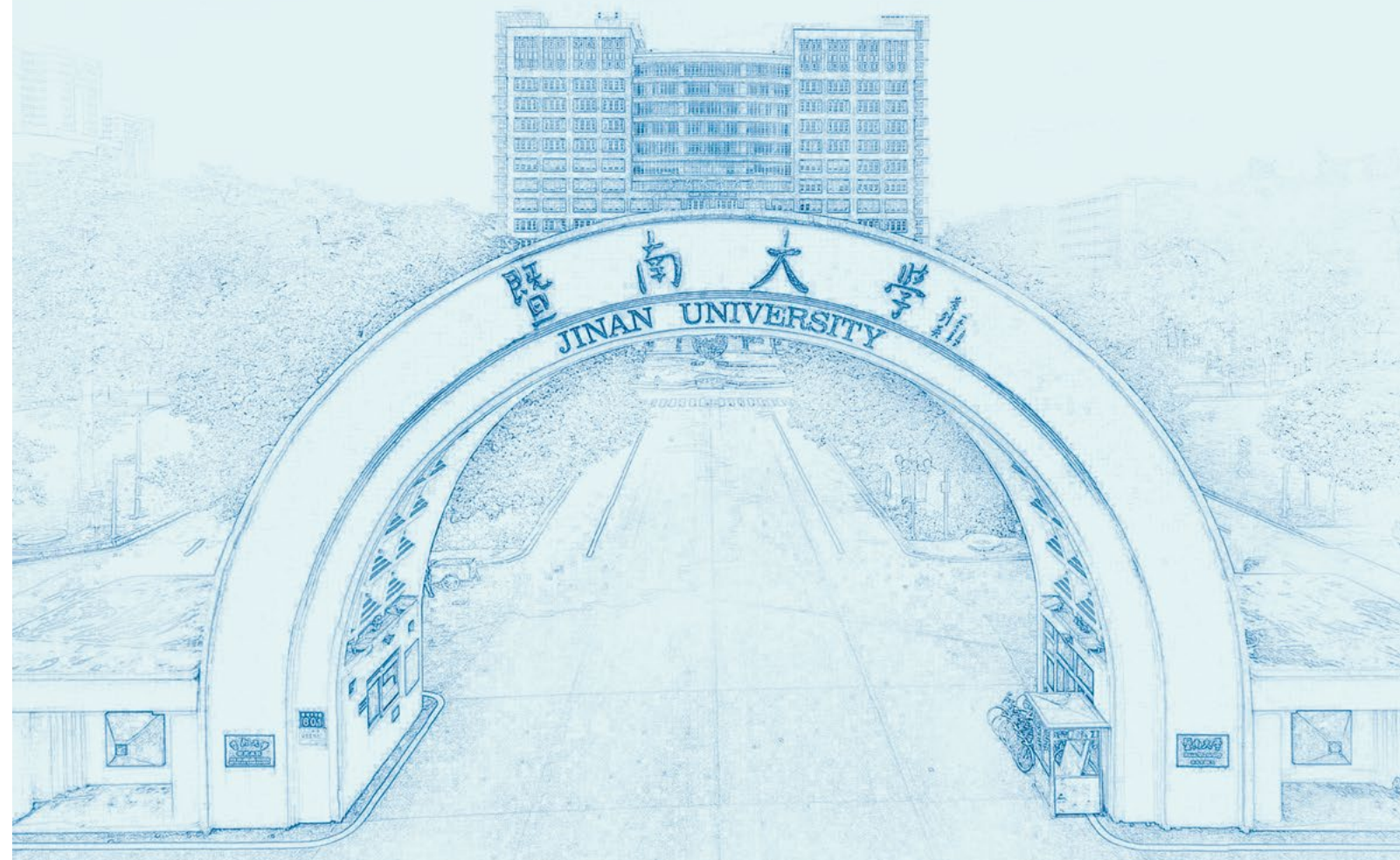
自 2008 年“蓝信封”诞生，13 年来项目执行方从学生社团逐渐转变成草根机构，继而发展成规模化的公益组织，现正积极进行数字化转型。目前，“蓝信封”通过学校微网页透明化展示志愿者与儿童的通信流程和物资捐赠使用记录，并试点推进学校端“云邮筒”，将儿童信件扫描读入并发送到志愿者手机端，通过信息化手段让项目开展更便捷，管理过程更规范化。



周文华与现场师生互动

讲座结束后，参会师生和主讲人积极互动，进一步了解项目开展细节，探索书信陪伴对于留守儿童的心理成长帮扶效用。

对外交流



我院调研团队赴云浮调研城乡低保情况



为进一步了解广东省内的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政策的发展和落实情况，2021年10月11日至10月13日，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乡村振兴研究院调研团队一行前往云浮市进行调研。调研人员包括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薛森、乡村振兴研究院研究助理张亚楠、社会调查中心执行督导农麟。调研团队先后与云浮市民政局、云城区民政局以及郁南县民政局展开座谈，并走访了多户接受社会救助的家庭，与当地一线民政干部和群众进行了深入交流。

在与云城区的座谈中，调研团队就当地低保申请和审核中的问题、低保信息系统中的问题进一步交流，并参观了广东省全国最低生活保障信息系统和广东省民政厅底线民生信息化核对管理系统的操作流程。在与郁南县的座谈中，调研团队主要就低保审批权下放、低保审核中的各项操作细节，以及社会救助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问题进行了讨论。同时，调研团队还走访了云城区和郁南县的低保、低收、特困家庭，了解其实际家庭情况和社会救助情况。



调研团队与当地民政干部交流



调研团队走访当地低保、低收、特困家庭

暨南乡村振兴研究院调研团队赴清远、韶关、肇庆、江门等地乡村风貌带调研



调研团队在各地农业农村局座谈

受广东省乡村振兴局委托，为了解省内各地区乡村风貌提升示范带的建设和运营情况，2021年10月11日至10月15日，暨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调研团队一行

前往清远、韶关、肇庆、江门四地乡村风貌带进行实地考察。调研人员包括暨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助理李承政，研究助理钱文文、周浩然、董文晋，宣传专员丘宇璐、余旭楷，“优博计划”博士生徐少癸。调研团队先后在清远市农业农村局、肇庆市凤凰镇政府、江门市崖门镇政府和韶关市仁化县农业农村局展开座谈，并实地考察了多条乡村风貌带，就当地风貌带的建设和后续规划进行深入了解。

在清远市的座谈中，调研团队主要了解了当地风貌带建设的基础和未来规划，并参观了连江口镇外立面建设、文化广场和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在肇庆市的座谈中，调研团队就凤凰镇风貌带的整体规划和可能遇见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实地考察了风貌带沿路和上水田村的休闲农业规划基础。在江门市的座谈中，调研团队主要针对崖门镇风貌带的连线成带工作和特色产业规划进行交流，并走访了多个特色村庄，考察沿路外立面和硬底化道路的建设及维护。在韶关市的座谈中，调研团队就浈丹公路的景村融合发展和民宿规划进行深入讨论，并参观了沿路自然基础和夏富村的古村落建设。

暨南乡村振兴研究院调研团队赴揭阳、潮州、汕头等地风貌带调研



受广东省乡村振兴局委托，为进一步了解广东农村“风貌带”建设情况，2021年10月11日至10月14日，暨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调研团队一行前往揭阳市、潮州市、汕头市乡村风貌带进行实地调研。调研人员包括乡村振兴研究院研究助理顾然、李德华、王少达。调研团队实地走访了揭阳市惠来县、潮州市潮安区、汕头市南澳县乡村风貌提升带，并先后与惠来县农业农村局、潮安区农村农业局、汕头市南澳县农业农村与水务局展开座谈。

在与惠来县的座谈中，调研团队就当地风貌带的资金来源、建设规划问题进行交流。在与潮州市农村农业局的座谈中，调研团队主要就茶旅产业发展现状、茶旅产业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风貌带建设中各职能部门的协调问题进行了讨论。在与南澳县农业局的座谈中，调研团队主要就当地风貌提升与旅游产业有效衔接问题进行了探讨。同时，调研团队还实地走访了惠来县、潮安区、南澳县风貌提升带，了解其实际建设情况。



调研组在潮州市潮安区叫水坑村调研



潮州市潮安区凤凰镇茶文化博物馆

冯帅章院长随林如鹏书记赴梅江区城北镇实地推进乡村振兴工作



11月30日，暨南大学校党委书记林如鹏与省侨联党组书记颜珂共同率队赴梅江区实地推进乡村振兴工作，旨在落实乡村振兴驻镇帮镇扶村定点帮扶工作，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围绕“三个阶段”目标要求、“五个提升”主要任务，探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推进乡村振兴的有效帮扶形式。我院院长冯帅章教授也随队陪同调研。

座谈会上，广东省侨联与暨南大学围绕如何更好地发挥驻镇帮镇扶村制度优势、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等方面交流了工作思路与设想。会后，调研组一行到城北镇上村村、扎上村、干光村等地实地走访，详细了解乡村产业发展、文化建设、农村人居环境、驻村帮镇扶村工作开展等情况。



现场参观

学生培养

我院三位同学获得暨南大学研究生 “创新发展共享”分论坛奖项

姓名	专业	培养层次	论文题目	作者排序	期刊类别	期刊分区	期刊名称	获奖等级	导师
李博文	区域经济学	博士	Latent but not Absent: The ‘Long Tail’ Nature of Rural Special Education and its Dynamic Correction Mechanism	第一作者	A2	三区, Q2	PLOS ONE	一等奖	张思思
			工会会员身份对农民工工资率的影响——基于代际差异的视角	第一作者	A2	无	《统计研究》		
李景荣	数量经济学	博士	Land titling and internal migr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	第一作者	A1	Q1	Land Use Policy	二等奖	徐吉良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and urban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	第一作者	A2	Q4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王逸飞	劳动经济学	硕士	人力资本集聚对城市工资与就业增长的影响——来自中国主要城市的证据	第二作者	B1	无	《劳动经济研究》	最佳墙报奖	刘诗濛

2021 年 12 月 15 日，由暨南大学研究生院主办，暨南大学经济学院、经济与社会研究院承办的暨南大学研究生创新分论坛在石牌校区中惠楼 323 室顺利举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创新发展共享”，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举办方式。

经过论文展示环节及评委评议，我院学子李博文、李景荣、王逸飞分别获得本次创新分论坛一等奖、二等奖及最佳墙报奖。

精英荟萃，语通中外——我院举办 2021 级国际精英班学期英语汇报展示



2021 年 12 月 29 日晚，经济与社会研究院（IESR）于曾宪梓科学馆 406 会议室举办了 IESR 第二届国际精英班（以下简称为“国精班”）学期英语读书汇报演讲展示。本次的汇报演讲由 IESR 院长冯帅章教授、副院长史炜副教授、朱宏佳副教授、陈思宇助理教授以及外国语学院院长赵雯教授、彭帆副教授、王璐副教授、冷璐博士等担任嘉宾和评委。



汇报展示现场

IESR 国精班起源于外国语学院申报的“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创新实践基地项目”。目前项目已经获得教育部批准，由宋献中校长担任项目负责人。在 2020 年开设的首届实验班培养中，同学们都受益匪浅。因此，今年的 2021 级新生，依然开设实验班进行培养。本届实验班的培养方案主要包含：一、通过基础书本内容教学提高同学们的英语基础能力；二、通过布置小组写作任务培养同学们的团队合作能力以及写作能力；三、通过设置《国富论》与《寂静的春天》两本著作的阅读，并以小组形式进行课堂演讲，丰富同学们的阅读面、提升同学们的英语口语。



冯帅章院长致辞

在本学期全新的教学安排中，IESR 2021 级的 20 名同学以饱满的活力和激情对待每一次的课堂。在本学期英语读书汇报演讲中，大家分 4 个小组带来了《国富论》及《寂静的春天》两本书的汇报展示。



第一组同学从货币发展、价值决定理论以及价值决定理论对当代的影响方面展开了演讲。



第二组同学通过引出《国富论》中主要观点“人天生是利己的”，并且结合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展开了演讲。



第三组同学介绍了世界名著《寂静的春天》一书的创作背景、作者如何用精准生动的语言展现自己的思想、书的影响以及阅读此书带来的启示。



第四组同学从《寂静的春天》看各国农药政策，并从生态和经济的权衡方面展开演讲。

在所有小组结束演讲以后，各位评委对所有同学的努力和付出给予了高度肯定与赞扬。同时，在英语发音、语法运用、演讲技巧以及 ppt 展示等多个方面也都给出了非常有价值的建议。经过评委们最终评定，刘昀轩（组长）、唐梦铃、张昕、杨立伟、邹鹏飞组获得第一名，钟裕威（组长）、彭晨熙、杨楠、陈世强、袁孟杰组获得第二名。在个人表现方面，排名前五的同学分别是：刘昀轩、钟裕威、张昕、张晓楠、唐梦铃，值得一提的是，刘昀轩同学的优异表现得到了评委们的一致肯定。



评委点评



赵雯院长总结

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典型特征，培养扎实的英语能力对于每一位学生都大有裨益。俗语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同学们在国精班学习到的不仅仅是书本上的内容，更重要的是如何高效进行英语学习的技巧，这些技巧相信同学们在日后的学习中也将发挥不可忽视的作用。正如外国语学院赵雯院长在最后的总结当中所讲：“the more we work, the more we think we can do and more will for us to develop.”

珠江经济学俱乐部

如何深度解构自我从而做“对”职业选择



2021年12月18日上午10点，“珠江经济学俱乐部第17期讲座暨IESR职业发展规划系列第七期讲座”在暨南大学曾宪梓科学馆406举行，讲座嘉宾罗聪具有的丰富从业经验，他本科就读于中山大学金融学专业，曾任百威亚太渠道营销经理、宝洁中国高级品牌经理，有八年消费品从业经验，现任某互联网大厂行业运营。本次讲座他分享了自己在大厂工作的经历与感悟。

正确做出人生选择

首先，罗聪介绍了大学生毕业后的三种道路以及商科学生未来所从事工作的大概框架。告诉大家要正确认识自己，从自己的优点、缺点和最终目的等方面认真做选择。之后，罗聪分享了自己择业的心路历程以及与同龄人交流所得的体会，为大家做借鉴与参考。

找工作要准备什么？

罗聪从“硬件”与“软件”两个方面介绍学生要在大学期间为择业方向努力靠齐，并从HR的角度详细解析了面试经典问题。

工作中获得发展需要的能力

罗聪认为在工作中想要获得发展，就要具有思考学习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实干能力、自驱力等基本能力以及韧劲、人品、价值观等高阶能力，希望同学们在大学这个重要的学习成长阶段，努力提升这些能力，为以后的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消费品领域相关工作的工作类型

罗聪根据自己多年的消费品工作经验，为大家详细介绍各种消费品领域相关的工作类型，为还没有步入职场的同学们摊开一幅全新领域的画卷、丰富了大家的认知。



同学们积极提问

最后，罗聪通过自己非常喜欢的一段话，“所有看似寻常，终将不可想象；所有不可想象，终将化为寻常”建议学生们要清楚自己的定位与目标，凸显长板，弥补短板，做新时代的弄潮儿。

图 说

